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二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年三月

從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滅佛

劉淑芬*

關於北魏太武帝的毀廢佛法，前此學者的研究大都環繞在國家的政策、宗教上的佛道之爭、思想上的儒釋之辨等方面來討論。本文嘗試著從一個比較大的背景來思考這個事件。

由於太武滅佛的引爆點是公元四四五年杏城盧水胡人蓋吳的反叛，不過，學者都沒有特別注意到在陝西起兵的蓋吳是盧水胡人，而盧水胡人是篤信佛教的，並且從這個角度來探討蓋吳反叛和滅佛的關連。從五世紀初以來，北魏和盧水胡政權的北涼有相當的互動關係，並且在公元四三九年攻下北涼的都城姑臧，把北涼王室和臣民三萬餘家遷到平城。不過，北涼國主的兩個弟弟卻遠走高昌，在那裡延續北涼的政權；而被遷到平城的王室成員也有人起來反叛。此外，從五世紀以來盧水胡人或是直接、或是間接控制著北魏和南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以上各項因素的盤結交錯，終於促成了太武帝的滅佛。

本文第二節首先討論五世紀上半葉華北、西北的政治地理，其中特別著重盧水胡的敘述，包括盧水胡的來源及其遷移，盧水胡的居住地區、以及其和西域、南朝的交通。第三節探討蓋吳的反叛。第四節討論蓋吳反叛中潛藏的滅佛宗教因素。第五節敘述太武帝的滅佛事件，以及滅佛之後一連串誅殺在平城的沮渠王族，實爲滅佛的後續行動，足以顯示出太武滅佛的背後實含有其對盧水胡族的猜疑。

關鍵詞：滅佛 民族 北魏 北涼 蓋吳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其中最早的一次是發生在北魏太武帝統治的時期 (424-451)。太武帝頒佈全面滅佛的詔令，是在他親自征討蓋吳反叛軍的過程中一個偶發事件所引爆的：太平真君六年 (445) 九月，在杏城（今陝西黃陵縣）的盧水胡人蓋吳起兵反抗北魏的統治，這支叛軍聲勢浩大，擴展迅速，北魏的政府軍連嚐敗績；因此這一年的十一月，太武帝乃御駕親征。太平真君七年 (446) 二月，太武帝和他的軍隊抵達長安，他的隨從無意中在其駐紮的寺院中發現了兵仗，太武帝因而懷疑寺院僧人和蓋吳通謀，於是下詔全面滅佛。[1] 關於此一滅佛事件，前此的研究大都環繞在國家的政策、宗教上的佛道之爭、思想上的儒釋之辨等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2] 然而，學者都沒有特別注意到在陝西起兵的蓋吳是盧水胡人，而盧水胡人是篤信佛教的，並且從這個角度來探討蓋吳反叛和滅佛的關連。

事實上，蓋吳反叛之所以成爲滅佛的引爆點，和五世紀上半葉盧水胡在西北、華北的活動——特別是和北魏政權的互動關係這個大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公元四〇一年，盧水胡人沮渠蒙遜首次建立了政權，國號「大涼」，後世稱之爲「北涼」，它的轄域恰好控制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四三一年，由於西涼和夏的相繼亡國，使得北魏和北涼的領土相鄰；又因當時北魏大致上已經統一北方，北魏無論是爲打通西域的道路，或是爲統一整個北方，向西攻滅北涼是必然的。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陷北涼都城姑臧（今甘肅武威），並且將北涼國主沮渠牧犍和他的家族，并臣民三萬餘戶遷徙到都城平城。不過，沮渠牧犍的兩個弟弟西走高昌，並且在那裡延續北涼的政權，一直到公元四六〇年才被柔然攻滅。

---

[1] 關於太武帝的滅佛，有學者認爲前後有兩次，即把公元四四四年發佈〈禁私養沙門詔〉，和公元四四六年的全面滅佛，等同視之。（向燕南，〈北魏太武帝滅佛原因考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2）實則，禁私養沙門不能視爲滅佛行動，故本文所謂的滅佛係指四四六年令僧人還俗、銷毀塔寺的全面滅佛行動。

[2] 塚本善隆，〈北魏太武帝の廢佛毀釋〉，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鼎文書局，1976），頁493-496；向燕南，〈北魏太武帝滅佛原因考辨〉；樂貴川，〈北魏太武帝滅佛原因新論〉，《中國史研究》1997.2 等。

在此同時，被遷到平城的沮渠王族和其臣民的活動、以及北魏境內盧水胡人的連續反叛事件，對太武帝而言，可以說都是如芒刺在背。因此，公元四四六年盧水胡人蓋吳起兵反抗北魏的統治，無疑是印證了他的疑慮。就宗教上來說，無論是建立北涼的沮渠王族，或是西走高昌延續北涼政權的沮渠無諱、沮渠安周，乃至於在陝西反叛的蓋吳，都是信奉佛教的；佛教徒之間宗教性質的聯繫，很可能被太武帝認爲是一種連結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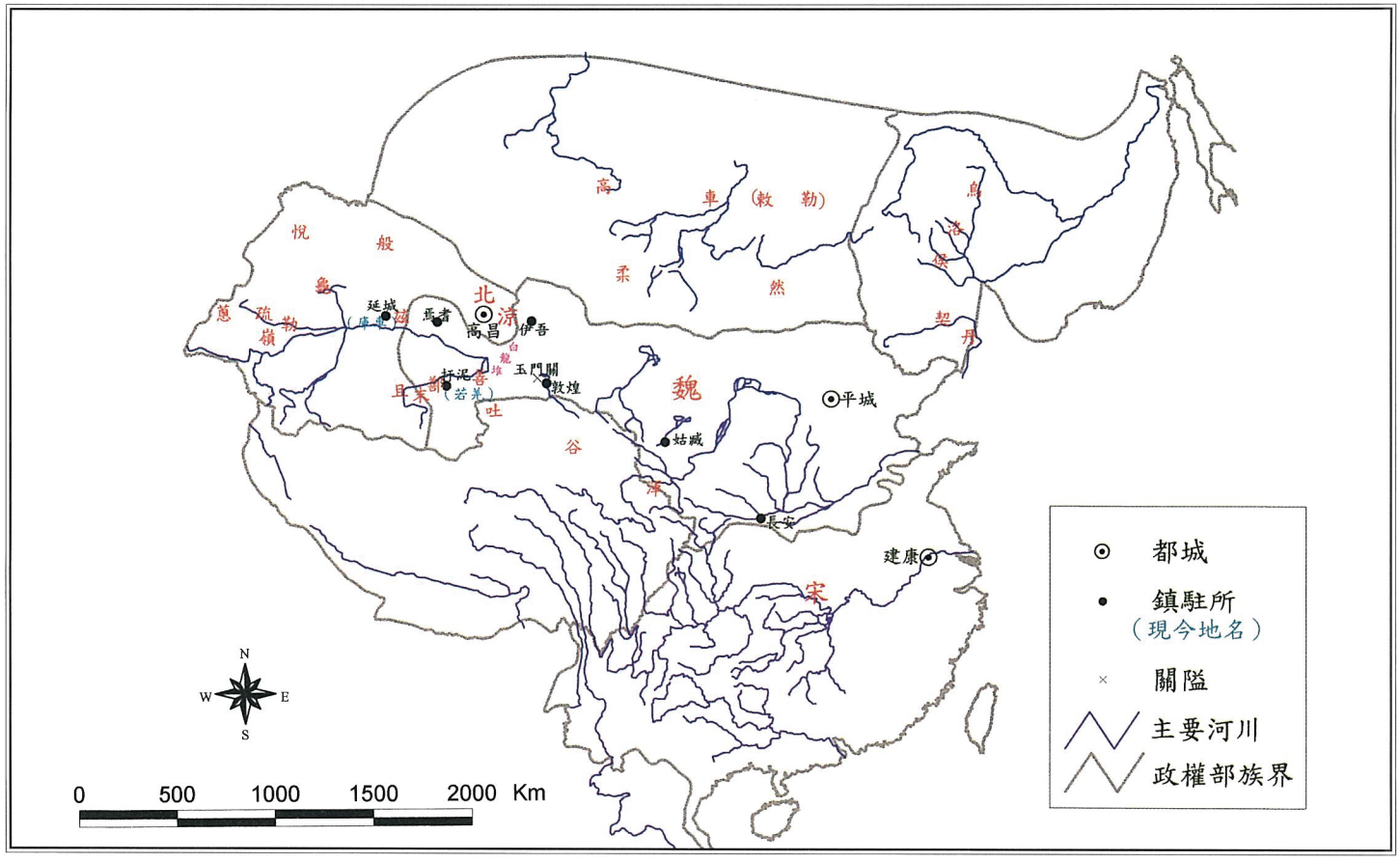
此外，盧水胡長期直接或間接控制中原和江南通往西域的陸路交通，在高昌的沮渠政權也和劉宋通使，而蓋吳起兵後也立即遣使向劉宋稱臣，請求派兵襄助。從北魏的立場看來，在陝西起事、並擴大其勢力及河西的蓋吳，或有可能西通同爲盧水胡的沮渠高昌政權，南引劉宋的援助，果真如此，就成爲一盤難以收拾的棋局了。

由上可知，蓋吳反叛所牽涉的問題很多，若不從上述諸方面加以探討，很難了解蓋吳反叛事件、以及因此引爆的滅佛行動之全貌。本文意圖透過五世紀上半葉西北、華北的情勢，以及鮮卑族北魏政權和盧水胡族的互動關係、盧水胡人的佛教信仰等角度，探討太武帝的滅佛事件。第二節首先討論五世紀上半葉華北、西北的政治地理，其中特別著重盧水胡的敘述，包括盧水胡的來源及其遷移，盧水胡的居住地區、以及其和西域、南朝的交通。第三節探討蓋吳的反叛，第四節討論蓋吳反叛中潛藏的滅佛宗教因素，第五節敘述太武帝的滅佛事件、以及滅佛之後一連串誅殺在平城的沮渠王族，實爲滅佛的後續行動，足以顯示出太武滅佛的背後實含有其對盧水胡族的猜疑。

在這裡要特別提出來說明的是：太武滅佛並不是單一因素所促成的，前此學者分別從國家的政策、宗教上的佛道之爭、思想上的儒釋之辨等方面討論，無疑地都是太武滅佛的原因，本文則是在這些因素之外，提供另一較大的背景來思考這個問題。

二、五世紀上半葉西北、華北的政治地理

五世紀上半葉，盧水胡主要活動的舞台在關隴、河西以至於西域，而此地正是多種民族雜居的地區；因此，蓋吳從陝西中部起事，遂出現「諸胡應之」的情況。本節首先敘述西北、關隴的政治地理，做爲了解蓋吳反叛事件的背景。（見圖一）



資料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Vol.4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空間資訊技術小組　繪製

圖一：五世紀上半葉的西北與華北

公元三一七年，西晉滅亡，晉室在南方立國，而北方則處於眾多政權分裂割據的局面，即所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其實先後建立的政權有二十多個），光是在西北地區先後就建立了十二個政權，佔了十六國的百分之六十弱。[3] 這些政權的建立者除了漢族（前涼、西涼）之外，還有匈奴（前趙、夏）、盧水胡（北涼）、氐（前秦、後涼、仇池）、羌（後秦）、鮮卑（南涼、西秦、吐谷渾），在這些政權中，建國時間較長的是北涼、仇池和吐谷渾，而以北涼和北魏有較密切的關連。

（一）民族雜居的關隴地區

第五世紀和第六世紀時，關隴地區——本文所指的是關中和隴西（隴山以西）地區，是一個民族雜居的地區，除了漢族之外，還有氐、羌、匈奴、休官、屠各、盧水胡等民族。

以關中地區而言，[4] 從公元第一世紀以後，非漢民族就陸續遷來此地的。漢代開始就有氐、羌族人陸續遷入關中、陝北等地，如公元五〇年南匈奴的投降漢朝、公元三十五年漢朝鎮壓羌族的動亂等。到第三世紀末年時，關中的非漢部族如氐、羌、匈奴、和其他雜胡的人口，約已佔了關中居民的一半。其中，氐、羌人數至少在三十萬左右，羌族主要分佈在長安東北、北部和西北；氐族則分布在長安及其以西諸縣。[5]

從第四世紀開始，北方進入歷史上「五胡十六國」時期，長安先後爲匈奴的前趙 (304-329)、氐族的前秦 (350-394)、羌人的後秦 (384-417) 政權所佔領，關中的部族就是以氐、羌和匈奴爲主。由於前趙建都在長安，因此長安及渭河北岸住有很多匈奴族；而前趙時被遷到長安附近的氐、羌也有二十五萬人之多。[6] 氐族苻氏建立前秦政權後，氐族又大量集中在關中，公元三八〇年（前秦苻堅建元

---

[3] 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45-46。

[4] 關中係指河南靈寶縣以西古代函谷關及其以西的陝西的關中盆地，本文主要是在陝西的關中平原及其鄰近的地區。

[5] 晉惠帝時，江統的〈徙戎論〉：「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韓香，〈魏晉南北朝時期陝西少數民族分布及姓氏〉，《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4：162。

[6] 韓香，〈魏晉南北朝時期陝西少數民族分布及姓氏〉，頁162。

十六年）前，在涇水和汧水流域的三原、九嵕（今醴泉縣）、武都、汧（今汧陽、隴縣）、雍（今鳳翔南），住著超過二十萬戶以上的氐人，雖然有十五萬戶後來被苻堅遷至關東，[7] 但此一地區仍有不少氐人。其後，關中地區陸續被氐人的後趙政權所佔領、並且成爲羌族政權後秦的都城，羌族又大量集中到關中地區。雖然在公元四二六年北魏佔領長安之後，也有鮮卑和其他雜胡遷來；不過，一直到第六世紀時，關中的少數部族仍以氐、羌和匈奴爲主。[8]

關中少數部族分佈的情形，隨著時代推移，略有更動。漢魏以來羌族原居於馮翊、北地一帶，但因鮮卑人的移入關中，同州、華州成爲北鎮軍人駐紮之地，住在馮翊郡東部的羌族遂向西移轉，與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和北地郡東部的羌族集中起來，居住在蒲城、白水、宜君、銅川等地。[9]

除了氐、羌之外，在關中盆地周邊也有屠各、休官、盧水胡。如上郡（治所在肤施縣——今陝西榆林縣東南）一地便有屠各、休官、羌和盧水胡。[10] 又，貳縣有盧水胡、屠各。[11] 六世紀時，關中一帶少數部族的分佈是：氐族集中在扶風、咸陽郡西北；羌族集中在馮翊郡；盧水胡、匈奴、西羌、北羌雜居在北地、新平郡，和馮翊郡的西部。[12]

由於關中地區民族複雜，北魏政府對關中這些不同的民族是很不放心的，唯恐他們作亂。北魏陸俟認爲：「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土，民多剛強，類乃非一。」[13] 公元四五一年，北魏太武帝攻打劉宋的盱眙，在他寫給劉宋守將臧質的信中，甚至說：「吾今所遣鬥兵，皆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氐、羌死，

---

[7]《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頁2903。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0。

[8]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頁6。

[9] 同前書，頁79-80。

[10]《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頁74：「上郡屠各隗詰歸率眾萬餘家內屬。」、「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內附。」另，《晉書》卷一一五，〈苻登載記〉，頁2949：「上郡羌酋金大黑」。《魏書》卷三〇，〈尉撥傳〉：「尉撥，代人也。……出爲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爲民。」

[11]《晉書》卷一一五，〈苻登載記〉，頁2949：「貳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

[12] 楊東晨，《陝西古代史》（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頁502。

[13]《魏書》卷四〇，〈陸俟傳〉，頁902。

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14] 北魏更在關中、陝西設立鎮戍，以便監視控制。北魏建國之初，就在李潤堡（今陝西蒲城縣東北）設置了護羌的戍所，六世紀初，華州刺史元燮描述州治李潤堡這個地方早年「胡夷內附，遂爲戎落」。[15] 此地的居民確實以羌族爲主，公元四四五年盧水胡人蓋吳反叛時，李潤堡的羌人起兵與之呼應。[16] 另外，北魏在今陝西盧水胡人主要聚集的地區——杏城，也置有鎮戍。[17]

至於河西地區（今甘肅、青海二省黃河以西的地區，即河西走廊與湟水流域），則先後有漢人的前涼 (317-376) 和西涼 (400-421)、氐人的後涼 (385-403)、鮮卑的西秦 (385-431)、盧水胡的北涼 (401-439)、匈奴鐵弗的夏 (407-431) 政權。因此，此地在漢人之外，並有以上各族和休官、屠各等民族。秦州（治所在上邽，今甘肅天水市）有羌族，天水郡（治所在上邽）有休官、屠各，涇州（治所先是在臨涇——今甘肅鎮原縣東南；後移治安定縣——今甘肅涇川縣北）、隴西（治所在襄武縣——今甘肅隴西縣東南）也都有屠各。[18]

（二）陝西的盧水胡

陝北是關中通往河西的通道，河西則是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因此，至少從

---

[14]《宋書》卷七四，〈臧質傳〉，頁1912。

[15]《魏書》卷十九下，〈安定王傳附子燮傳〉，頁518，記元燮上書云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邑非舊邑先代之名，自國初，護羌小戍。……」

[16] 同前書，卷四下，〈世祖紀下〉：「（太平眞君七年三月）車駕旋軫，幸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17] 公元四四五年三月，郝溫在杏城起兵反叛，當時他就是杏城鎮將。《魏書》卷四五，〈韋閬傳〉，頁1009：「屬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閬盡心撫納，所部獨全。」

[18]《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楊椿傳〉，頁1285：「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眾反。」同書，卷五一，〈封敕文傳〉，頁1136：「略陽王元達酥梁會之亂，聚眾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同書，卷五一，〈呂羅漢傳〉，頁1138：「上邽休官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同書，卷三，〈太宗紀〉，頁60：「河西屠各帥黃大虎、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內附。」同書，卷三一，〈于栗磾傳附子洛拔傳〉，頁737：「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鎮，私署王侯，……」。《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頁2967。

漢代以降，上述地區的民族就有相當程度的互動，如我們以下要談到的居住在陝西的盧水胡，就是從河西遷移來的。北涼政權的建立者盧水胡沮渠蒙遜之母車氏就是西域胡，[19] 沮渠蒙遜之妻彭氏可能是羌族。[20] 又，在盧水胡人蓋吳反叛的隊伍中，部落帥白廣平就是龜茲國姓。[21]

關於盧水胡的族屬和來源，從周一良提出他的看法以後，有不少學者討論，也有不同的意見。[22] 本文主要依據趙永復和王青的看法，盧水胡是因盧水而得名的，此盧水乃是指安定郡的盧水而言。[23] 按西漢始設安定郡，治所在高平（今寧夏固原）；東漢移治臨涇（今甘肅鎮原縣），北魏時移治安定縣（今甘肅涇川縣東北）。至於盧水胡的來源，則是出於月氏胡。西漢時，月氏胡因爲受到匈奴的攻擊，而西遷至錫爾河之南，史稱「大月氏」，部分未西遷的月氏胡則分別集中住在三個地區：（一）住在敦煌、祈連山之間的南山地區者，叫做「小月氏」；後來他們又進入湟中，稱爲「湟中月氏胡」。這些月氏胡因和當地的羌族錯居，而成爲雜胡。（二）留在老家的張掖一帶的月氏胡，因爲臣服於匈奴，而成爲匈奴別部。（三）還有一部分月氏胡被漢朝政府集體遷至安定郡，建有月氏城，這一支月氏胡又稱爲「盧水胡」。這三個地區同時也是盧水胡的聚居地，北涼政權的創建者沮渠蒙遜就是臨松盧水胡人，他的祖先則是曾臣服於匈奴的月氏人。[24]

居住在陝西省中、北部的盧水胡人，則是從安定郡遷來的；[25] 多集中在杏城一帶。最晚從東漢末年開始，安定盧水胡就有移徙的跡痕，他們沿著陸路東進陝北中部地區。三世紀初，史籍中就有陝北盧水胡活動的記載。公元二一七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命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駐紮在池陽（今陝西涇陽

---

[19] 周偉洲，〈試論吐魯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考古與文物》1980.1：101。

[20] 王素，〈北涼沮渠蒙遜夫人彭氏族屬初探〉，《文物》1994.10：46-47。

[21]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156-157。

[22]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403-414；王宗維，〈漢代盧水胡族的族名與居地問題〉，《西北史地》1985.1；趙永復，〈關於盧水胡族的族源及遷移〉，《西北史地》1986.4；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西北史地》1997.2。

[23] 趙永復，〈關於盧水胡族的族源及遷移〉，頁43-46；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頁25-26。

[24] 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頁27。

[25] 同前文，頁28。

縣），以防備渭河以北、關中平原北緣的北山以北的盧水胡。[26]《三國志》中也記載陝西盧水胡降服於曹魏之事，魏文帝延康元年 (220) 五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裴注引《魏書》：「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左馮翊的北境到達今陝西黃陵（即杏城）、洛川。此處所謂的「山賊」，可能就是指此一地區的盧水胡。[27]

（三）盧水胡的政權——北涼

從三世紀以後，盧水胡開始有他們的政治活動，西晉末年，他們曾起兵反抗當政者。四世紀以後，盧水胡人更有建立政權的意圖和行動，但沒有成功，一直要到五世紀沮渠蒙遜方建國於河西。

西晉末年，關中各族起兵反叛，盧水胡也在其列。惠帝元康四年 (294) 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到八月時，郝散率眾降，而為馮翊都尉所殺。兩年之後——元康六年 (296) 五月，郝散之弟度元率領著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叛，攻打北地郡。八月，郝度元擊破雍州刺史，秦、雍氐、羌都起來反叛，推氐人齊萬年為帝。唐長孺認為：上黨是羯胡聚居之地，羯胡屬雜胡，盧水胡也是雜胡，郝氏是盧水胡大族，所以郝散可以統領盧水胡反叛。[28] 不過，如前述王青的研究中所言，西漢時月氏為匈奴所擊而西遷，一部分未遷者由漢朝政府遷至安定郡，此一支月氏胡即是「盧水胡」，而另有一部分月氏胡留在老家的張掖一帶，臣服於匈奴；可以統領盧水胡的匈奴郝氏，不妨視之為此一支月氏遺裔，他們事實上和盧水胡是同一族源的。

四世紀中，陝西盧水胡曾有建立政權的意圖，而未能成功。公元三八六年三月，前秦政權瓦解之後，慕容沖率眾東下，長安空虛時，滎陽高陵、趙穀等人，招杏城盧水胡郝奴率四千人入居長安，郝奴遂在此稱帝，以趙穀為丞相。《晉書・姚萇載記》云：「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渭北的

---

[26]《魏志・梁習傳》裴注引《魏略》云：「（建安）二十二年 (217)，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池陽屬左馮翊，即今陝西涇陽縣。趙永復，〈關於盧水胡族的族源及遷移〉，頁48。

[27] 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頁29。

[28]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08。

杏城一帶本是盧水胡人聚居之地，故多響應其同族人的郝奴。四月，後秦姚萇抓到郝奴之弟郝多，郝奴懼而請降，姚萇拜他爲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29] 郝奴稱帝建國的夢很快就破滅了。十餘年後，道武帝天興元年 (398)，郝奴率其族人降附於魏。[30]

五世紀初，在河西的盧水胡人沮渠蒙遜建國「大涼」（即後世所稱的「北涼」），這個政權持續超過半個世紀之久。四世紀末，後涼呂光因討伐西秦失利，而殺了從征的盧水胡沮渠羅仇、沮渠麴粥兄弟，沮渠蒙遜爲了替叔父復仇，而召募族人起兵反呂光。沮渠氏最初是擁立後涼的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元年 (397)。然而，段業的才幹不足兼以氣量狹小，他一方面仰賴沮渠蒙遜的開疆拓土，另一方面卻猜忌其能力，是以後來沮渠蒙遜遂反叛段業。公元四〇一年，蒙遜殺段業，占據張掖，稱涼州牧、張掖公，改元永安，建立了盧水胡的政權。公元四一二年（北涼玄始元年），蒙遜遷都姑臧（今甘肅武威）。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佔姑臧，北涼國主沮渠牧犍（沮渠蒙遜之子）投降，北魏遷涼州吏民三萬戶至平城。

雖然沮渠牧犍投降了北魏，並且被遷徙到平城；不過，部分沮渠王族仍在河西抵抗魏軍，更在公元四四二年佔領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從公元四三九年至四四二年，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無諱仍繼續據有酒泉、敦煌；公元四四二年，沮渠無諱放棄敦煌，遠走新疆，占領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九月，更佔領高昌。次年 (443)，稱涼王；也就在這一年，無諱病亡，無諱弟安周代立，改元承平。[31] 從高昌出土的北涼文書，顯示無諱、安周都把其政權視爲北涼政權的延續。[32] 也就是說，雖然涼王牧犍被俘虜至平城，但沮渠氏的政權並未完全消

---

[29]《資治通鑑》卷一〇六，〈晉紀〉二八，孝武帝太元十一年，頁3363。

[30]《魏書》卷二，〈太祖紀〉，頁32。

[31] 柳洪亮依《高僧傳・釋法進傳》，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考證，太平眞君四年 (443)，無諱病亡，安周代立，改元承平。見柳洪亮，〈試論"承平"年號非且渠無諱所建〉，《一九九四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頁84。

[32] 公元四四三年，沮渠無諱稱「涼王」，改元「承平」，自稱「大涼」。《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酋豪。」＊按：據吐魯番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夫人彭氏墓中出土的帛書「衣物疏」：
大涼承平十六年歲在戊戌十二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大且渠武宣王夫人彭謹條隨身衣被雜物疏，所止經過，不得留難，急急如律令

滅，沮渠兄弟仍據有昔日北涼高昌郡之地，唐長孺把它叫做「高昌沮渠政權」(442-460)。[33] 直至公元四六〇年，高昌沮渠政權才爲柔然所併滅。因此，近年來不少學者認爲北涼政權至四六〇年才告亡國，享國六十年。[34]

北涼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北涼國主沮渠蒙遜、沮渠牧犍都崇信佛教，敬事僧人，贊助佛典的翻譯；公元四三九年以後，隨著沮渠無諱、安周西遷的涼州人士有萬餘家——其中也有一部分僧人，最著名的是法進，[35] 而沮渠安周即使在遐方的高昌，仍持續推展佛教，從事建寺、造像、譯經等活動。

（四）盧水胡和西域的交通

五世紀時，由於盧水胡人主要居住在河西到陝西中、北部一帶，遂得以控制中原和南方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四三九年北魏討伐北涼的原因之一，是北涼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36] 日本學者前田正名甚至認爲：從公元四四五年到四四七年間，先後有盧水胡蓋吳和吐京胡曹僕渾的反叛，其原因之一是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佔姑臧後，便開始爭奪從河西走廊經秦州路、鄂爾多斯沙漠南緣路——平

承平十六年十二月閏十八日（公元459年2月6日）
（吐魯番地區文物保管所，〈吐魯番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9：77。）
吐魯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了一方石墓表，上書「大涼承平十三年歲在乙未…」，承平十三年即公元455年。（周偉洲，〈試論吐魯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考古與文物》1980.1：99。）

[33] 唐長孺，〈北涼承平七年寫經題記與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期(1979)，頁5。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34] 王仁俊，《敦煌石室眞蹟錄》，附〈北涼且渠安周造寺功德刻石〉，葉1-6；齊陳駿、陸慶平、郭鋒，《五涼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頁141；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洪濤，《五涼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14-118；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頁122-123。

[35] 榮新江，〈"且渠安周碑"與高昌大涼政權〉，《燕京學報》新5(1998)：77-78。

[36] 太延五年，太武帝親征北涼，詔公卿作書數沮渠牧犍十二大罪狀，其中第四條是：「知朝廷志在懷遠，固建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附子牧犍傳〉，頁2207。

城交通路線的控制權所致。[37] 由此可見，蓋吳的反叛作爲滅佛事件的引爆點，也和盧水胡對西域交通之爭有間接的關連。

1. 公元四三九年以前盧水胡和西域的交通

盧水胡的北涼政權控扼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在公元四三九年以前，北涼有一段時期實際掌握從敦煌西去的「大海道」和「伊吾道」。第二，盧水胡的族屬可能和它能夠控扼西域的道路有相當的關連。由於盧水胡的來源就是月氏胡，北涼政權的統治者與大月氏民族相同，因此吸引了許多來自粟特的商人——即粟特地區的大月氏人，來到姑臧經商。《魏書・粟特傳》：「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38]

北涼之所以能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和其所管轄的地域有關，最主要是高昌，其次是敦煌。從漢代以降，高昌就是中、西交通最重要的據點，要通西域必得控制此地。高昌故城（在今新疆吐魯番縣城東二十餘公里）控扼天山北路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進入天山南路的通道，是「西域的門戶」。從西漢宣帝至東晉明帝時，高昌一直是中原王朝西域戊己校尉屯駐之地。至公元三二七年，前涼張駿在此地設高昌郡；其後先後佔有此地的諸國包括前秦、後涼、西涼、北涼，也都沿而不改。沮渠蒙遜建國以後，在公元四二〇年攻打西涼，入據酒泉；公元四二一年，攻佔西涼最後一個據點敦煌，而高昌也歸北涼管轄。北涼全盛時期，其勢力範圍包括：河西地區、西海（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金城（治所在今蘭州市西北黃河南岸）、西平（治所在今青海西寧市）、樂都（治所在今青海樂都縣）。[39]

公元五世紀初，柔然汗國建立後，最初是西涼、北涼和柔然對高昌地區的爭奪，後來是北魏和柔然對高昌地區的爭奪。公元四〇〇年，西涼建國之初，攻打玉門以西諸城，恐怕指的就是伊吾、高昌；而西涼沿前涼之舊，也在高昌設郡。不過，西涼對高昌統治時間很短，約在公元四〇五年就結束了。[40] 公元四〇二年，柔然部帥社崙征服了高車諸部，建立柔然汗國；不久，它的西界就越過高

---

[37] 前田正名著，李憑、孫耀、孫蕾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155。

[38] 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頁25-28。

[39] 董玉祥、杜斗城，〈北涼佛教與河西諸石窟的關係〉，《敦煌研究》1986.1：90。

[40] 段連勤，〈公元五世紀上半葉高昌歷史發微〉，《西北史地》1988.4：98。

昌、車師，而到達焉耆，後來又將其勢力發展到高昌、伊吾，從而威脅及西涼。公元四〇五年，西涼爲柔然所逼迫，將都城從敦煌向東遷至酒泉。然而，由於西涼國的東面是沮渠氏的北涼，其國勢較西涼爲強，因此，西涼有可能稱臣或求和於柔然。[41]

大約在公元四二一年至四二三年之間，北涼實際上據有高昌之地。[42] 公元四二一年三月，北涼沮渠蒙遜滅西涼，西涼國主李歆自殺。當時，柔然國內有汗位爭奪的內亂，不暇他顧，北涼遂佔領高昌。在沮渠蒙遜據有高昌這段期間，更乘機擴展其勢力到其他西域國家。《資治通鑑》記載：公元四二一年三月：「於是西域諸國皆請（詣）□□（蒙遜）稱臣朝貢。」而《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十六國春秋輯補》皆稱「西域三十六國」。[43] 公元四二三年，柔然大檀可汗殺了步鹿真可汗，結束內亂，便大舉侵魏，並寇河西，破北涼晉昌郡城，殺守將沮渠蒙遜世子政德，高昌又落入柔然的羈絆。雖然北涼對高昌的直接統轄時間並不長，但在某些時期內由於北涼和柔然的關係改善，[44] 以及北涼仍然統治敦煌，因此，北涼仍然控制著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北魏通使西域都必須經由北涼的護送。

北涼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大海道」和「伊吾道」這兩條路線。兩漢時期開闢了南、北兩條通往西域的道路，「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經若羌、于闐，越蔥嶺；「北道」西出玉門關，經樓蘭、焉耆、庫車，而越蔥嶺。到了魏晉南北朝時，又多一條新的道路，即從玉門關往西北方向走，抵達高昌，向西至焉耆，和北道會合。新道有二個路線，即「大海道」和「伊吾道」。「大海道」西出敦煌後，避開艱險的白龍堆，穿越渺無人煙的沙海，至柳中縣東南九十里出沙海，這也是大海道通往高昌的咽喉之地。由於此一路線要通過大沙海，唐人稱之爲「大海道」。北涼政權相當積極維護這條交通路線，在吐魯番出土了兩件北涼「守海」（即守護大海道之意）文書，[45] 內容是北涼王國兵馬曹下令：高昌、橫截、

---

[41] 同前文。

[42] 同前文，頁100。

[43]《宋書》卷九八，〈氐胡・大且渠蒙遜傳〉，頁2414；《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六，〈北涼錄二・沮渠蒙遜〉，頁665。

[44] 段連勤〈公元五世紀上半葉高昌歷史發微〉一文，認爲從公元432-433年之間，高昌又出現了北涼年號的文書，和此有關，頁100。

[45] 黃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頁434-435。

田地三縣發人發騎守海，役期十日。此外，吐魯番也出土了六件西涼和北涼時期「守白力」（戍守白力）的文書；白力，又作白蘇或白棘，位於高昌之東一百六十里，是控制高昌通往伊吾的咽喉。[46]

在上述兩條新道中，伊吾道時斷時續，這是因爲從東漢至唐初，伊吾一直處在內地王朝和匈奴、柔然、西突厥等勢力的爭奪之中，內地王朝並不能長期控制伊吾。因此，大海道就成爲重要的替代道路。[47]

2. 公元四三九年以後盧水胡和西域的交通

北魏攻下姑臧以後，公元四四二年沮渠牧犍的弟弟無諱佔領高昌，在那裡延續著北涼的政權，同時也持續控制著通往西域的道路。由於沮渠無諱、安周的佔據高昌，北魏僅能經由鄯善以通西域；因此，後來北魏的攻襲鄯善，就是爲了要剷除通往西域的阻礙。

公元四四四年三月，北魏曾經遣使者四輩使西域，而爲鄯善所阻撓，[48] 因此，公元四四五年四月北魏遂遣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以西兵攻襲鄯善；八月，萬度歸以輕騎五千襲鄯善，鄯善王真達出降，被送往平城。《資治通鑑》在此下云「西域復通」，[49] 可見太武帝攻打鄯善，是爲了要打通西域的道路。北魏在襲取鄯善成功之後，在公元四四八年又派遣萬度歸更進一步征討焉耆、龜茲。在這個戰役中，車師王車伊洛、和投奔車師的西涼餘裔唐和，奉詔協助魏軍征討，破焉耆東關七城，焉耆平，萬度歸命唐和率軍鎮焉耆。不過，由於車師王車伊洛助討焉耆，留下他的兒子歇率餘軍守交河城，在高昌的沮渠安周乘機引柔然三道圍攻交河城。至公元四五〇年，安周攻陷交河城，滅車師國，車師王車伊洛暨子歇奔魏，至此，沮渠氏完全控制了高昌地區。

---

[46] 王炳華，〈絲路"新疆段"考古新收獲〉，收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頁310-311；黃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頁434-435。

[47] 黃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頁431-458。

[48] 唐長孺推斷：當時鄯善不讓北魏遣使與西域相通。因爲公元四四二年沮渠無諱進兵高昌時，曾命其從弟沮渠豐周留守鄯善，雖然可能不久後就撤離了，但鄯善一度是在沮渠政權控制下，至少也是在政治上受其影響的，因此他們聯合抗拒北魏勢力西進。又，約在同時（公元442-444年之間），高昌遣往劉宋的使人卻可以取道鄯善。見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頁180-181。

[49]《資治通鑑》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頁3913。

（五）劉宋、盧水胡和西域的交通

從四世紀初至五世紀中葉，在河西立國的諸政權，如前涼、西涼、北涼都處於諸強權中，往往遙遙寄望南方王朝東晉、劉宋政權的聲援，而和其通使往來。河西政權和南方王朝來往的路線是繞經吐谷渾（今青海省）的領地，再東行入益州，南下建康，即所謂的「河南道」。（河南國多指吐谷渾，有時也指西秦）劉宋、南齊時，柔然和南朝也透過此一道路，互相通使。[50]

從收藏在東京書道博物館兩通署名涼王沮渠安周的寫經跋文，顯示了沮渠高昌政權和劉宋有相當程度的來往。寫於四四九年的《持世經》持世第一，「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經，吳客丹陽郡張杰祖書寫，用紙廿六路張」，寫經人是來自南朝的善書者張休祖；和《佛華嚴經》卷二八，「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廿紙」，此經本是佛陀跋多羅在建康譯出的。[51]

北魏顯然知道劉宋和沮渠高昌有來往，爲了阻止劉宋透過河南道和沮渠高昌政權、西域、柔然來往，在太平真君五年 (444) 八月至太平真君六年 (445) 八月，前後一年的期間，三度發動對吐谷渾的戰爭。這三次的出兵，魏軍大勝，迫使吐谷渾慕利延西渡流沙，到于闐去避難，到太平真君七年 (446) 才回到故土。[52]這兩年之內，由於北魏討伐鄯善，以及對吐谷渾的戰爭，使得高昌——鄯善——吐谷渾——益州，然後東下建康這條交通路線不能通行。[53]

從北魏爲阻斷盧水胡的高昌沮渠政權和劉宋的連絡，不惜三次出兵吐谷渾，可知北魏是很在意兩者的連結。然而，公元四四五年陝西盧水胡蓋吳起兵反叛，其勢力很快就擴散到河西，同時蓋吳也兩度遣使請求劉宋的援助，使得北魏對於盧水胡——包括沮渠高昌政權和蓋吳的叛軍、和劉宋之間的串連，具有相當的警戒心。此外，蓋吳起兵的陝西中北部恰好位處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有相當的重要性，《讀史方輿紀要》對於長安——陝北——河西——高昌——西域這條路線

---

[50] 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頁179-180。

[51] 池田溫著、謝重光譯，〈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學輯刊》1988.1/2：148-149。

[52]《魏書》卷四，〈世祖紀下〉：「（太平眞君五年八月），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太平眞君六年）四月庚戌，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白蘭。……（八月壬寅）高涼王那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慕利延遂西入于闐國。」又，《北史》卷九六，〈吐谷渾傳〉：「（太平眞君）七年，乃還舊土。」

[53] 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頁180-181。

的相關性，有很具體的說明：「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54] 又，對於陝北在這條路線上的重要性，延安府條云：「府東帶黃河，北控靈夏，爲形勝之地。……漢逐匈奴，恆自上郡而北，蓋其地外控疆索，內藩畿輔。上郡驚，則關中之患已在肩背矣，晉失其馭，并雍之間，遂成戎藪，歷數百年而未息。」[55]

公元四四五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北涼承平三年），在長安——陝北——河西——高昌這條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線上，高昌有延續北涼的盧水胡沮渠政權——當時的涼王沮渠安周是北涼國主沮渠蒙遜之子，也是被羈押在平城的北涼遜王沮渠牧犍之弟，他不僅控制了西域的道路，也和劉宋經由河南道互相通使，並且作爲南朝和西域交通的代理人。當盧水胡蓋吳在陝西起兵反叛時，其勢力向西擴展至河西，南攻長安，同時向劉宋求請援助。太武帝可能深深感到盧水胡族對北魏統治的威脅：沮渠高昌政權不僅阻礙了北魏通往西域的道路，蓋吳叛軍的勢力並且擴及河西，亟可能連結同是盧水胡族高昌政權（也和劉宋通使往來），同引劉宋爲援，使得北魏腹背受敵。太武帝從蓋吳反叛時，感受到盧水胡的威脅，也顯示在蓋吳亂平之後，一連串誅殺在平城的沮渠王族（439年平姑臧時遷來的）之事件。

三、蓋吳的反叛

蓋吳反叛前，盧水胡人的一些活動，使得太武帝對盧水胡人存有疑忌，蓋吳的反叛恰好証實了他的懷疑。

（一）盧水胡人反抗北魏的前例

在蓋吳反叛之前，就有兩件盧水胡人反抗北魏統治的前例：一是太平真君五年 (444) 北涼王族沮渠秉在山西的謀反，一是太平真君六年 (445) 三月郝溫在陝西杏城的反叛。

沮渠秉是沮渠蒙遜之子，公元四三九年他和涼王沮渠牧犍（沮渠蒙遜之子）等王族一同被遷到平城，太武帝任命他爲東雍州刺史（治所在南太平郡，後改爲

[5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六三，頁2711。
[55] 同前書，卷五七，頁2487-2488。

正平郡，在今山西新絳縣）。太平真君五年，他和當地的蜀族強宗薛安都，[56] 共同謀反，而被收執到平城處死。《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云：「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父故，拜爲東雍州刺史。險詖多端，真君中，遂與河東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值得注意的是：太武帝將他交由其兄弟扼殺，其間頗有「殺雞警猴」的意涵，警告東遷的沮渠王族不可輕舉妄動。上述資料中並未記載沮渠秉謀反的時間，但在同書的〈薛安都傳〉則說「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逆，事發，奔劉義隆。」《資治通鑑》則記載沮渠秉是在太平真君五年七月癸卯被處死的，[57] 同謀的薛安都則潛逃投奔劉宋。

在這裡要特別指出：河東蜀族薛氏（史稱「蜀薛」）和陝北的盧水胡人向來維持良好的關係，在北魏的歷史上，他們有好幾次是採取相同立場。北魏建國初年，這兩個集團曾經同時歸附北魏，道武帝天興元年 (398)，夏四月「鄜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河東蜀薛榆、氐帥苻興，各率其種內附。」[58] 不過，這兩個集團在降服北魏之後，似乎並沒有完全得到令他們滿意的待遇；因此，兩者又採取實際的行動表達他們的不滿。太平真君五年，沮渠秉協同河東蜀薛安都謀反；一年之後，陝北盧水胡蓋吳反叛時，河東蜀族的薛永宗也起來反抗北魏的統治，兩者並且互通聲氣。從盧水胡人和河東蜀薛的聯合反叛，似乎反映了北魏在對待這些降服民族的政策上，有所缺失。

然而，相較於遷居河東的蜀族，盧水胡人的起事更爲頻繁。太平真君六年 (445) 三月，郝溫反於杏城。杏城的盧水胡勢力很大，以郝、蓋二姓爲大姓，[59] 北魏可能有鑒於此，因此以盧水胡人爲當地的守吏，郝溫其人就是杏城鎮將，《魏書》卷四五〈韋閬傳〉：「屬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武都太守韋）閬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又，同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六年三月）酒泉公郝溫反於杏城，殺守將王幡，縣吏蓋鮮率宗族討溫，溫棄城走，自殺，家屬伏誅。」由上可知，至少有一部分的盧水胡人擔任了當地的守吏。由於

---

[56]《魏書》卷四二，〈薛辯傳〉：「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家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眾，故世號三薛。父強，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強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

[57]《資治通鑑》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一年，頁3906。

[58]《魏書》卷二，〈太祖紀〉，頁32。

[59]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0：「郝氏爲杏城盧水胡的大姓，蓋姓也是盧水的大姓。」

北魏以同是盧水胡的縣吏蓋鮮率領宗族討伐郝溫，這個反叛事件很快就結束了。北魏政府對於盧水胡和河東蜀薛的反叛，都是採取利用其族人來制服他們的策略，而得以平息紛亂。太平真君六年河東蜀薛永宗反叛時，太武帝也是利用河東蜀薛的另一支系，切斷他和蓋吳的聯繫。[60]

（二）蓋吳的反叛

太平真君六年三月，盧水胡郝溫甫於杏城起事失敗；六個月之後，蓋吳在同一個地方以更大的規模反抗北魏的統治。

在北魏太武帝時，民間出現了「滅魏者吳」的讖言，[61] 太平真君六年九月，蓋吳在陝西杏城起兵反抗北魏。這個反叛事件和先前沮渠秉、郝溫的反叛事件不同，第一，蓋吳的反叛似乎事先就有某種程度的策劃，因此在起兵不久之後，就迅速取得了從陝西到甘肅多種非漢民族的響應，並且和這一年十一月在河東反叛的蜀族薛永宗聯繫，來勢洶洶，勢力極爲龐大。第二，蓋吳開始起事不久，就自號「天台王」，顯然有建立政權的企圖。第二年，他又改稱「秦地王」，意圖接收河西氐、羌、屠各等族的勢力。第三，蓋吳初起兵時，也立即遣使劉宋請求援助。以上三者，都顯示了蓋吳的雄心意圖。

蓋吳的反叛陣營裡，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加入，包括：漢族、盧水胡、屠各、氐、羌、蜀（即叟），新平、安定諸夷酋。範圍擴及：秦隴的金城、天水、略陽，東及河東，南至渭水南岸長安、盩屋。[62]《魏書》卷一一五〈天象志三〉云：「（太平真君六年）九月，盧水胡蓋吳據杏城，僭署百官，雜虜皆響從，關內大震。」這固然是因爲關隴地區是多民族分佈的地區的緣故，但從蓋吳起事以後，即署置百官，並遣使劉宋，又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等策略而言，[63] 上述諸民族的參與似乎也不是偶然的風從響應。

---

[60]《魏書》卷四二，〈薛辯傳〉，頁941-942：「（薛辯）長子初古拔，……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61] 施光明，〈北魏蓋吳起義及其性質初探〉，《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專學報（社科版）》1991.3，認爲這讖言是蓋吳所散佈的。

[62]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0。

[63]《資治通鑑》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頁3915。

太平真君六年九月，蓋吳在杏城的天台（地名）起兵反魏，此事似乎應驗了當時流行「滅魏者吳」的讖言。然而，「吳」可以解讀爲蓋吳，也可以指立國的南方王朝劉宋。這一年的十月和次年的二月，蓋吳先後兩度遣使劉宋，請求派兵援助。[64] 宋武帝並未派兵相助，僅是封他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並遣使送秦、雍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65] 無論如何，蓋吳的反叛對北魏太武帝的心理有著相當大的衝擊。

蓋吳的反叛是北魏建國以來最大的內部動亂，太武帝動員了很多軍隊，仍然無法敉平，只好御駕親征。以下略述討伐蓋吳的戰事：太平真君六年九月，蓋吳起兵反叛；十月，長安鎮副將拓跋紇率眾討伐，兵敗戰死。蓋吳聲勢急速擴大，「諸夷戎普皆響應」，軍隊達到十餘萬人之多。[66] 太武帝緊急調撥高平、敕勒騎兵到長安，並且以將軍叔孫拔率領并、秦、雍三州兵，在渭北防堵蓋吳的軍隊渡過渭河以攻長安。十一月時，蓋吳的軍隊兵分四路，進攻陝西省西部和東南部：

一、蓋吳的部落酋帥白廣平向西掠地至新平（治所在今陝西省彬縣），進軍汧、隴，由於其聲勢盛大，安定（治所在今甘肅涇川縣北涇河北岸）的氐、羌夷酋都起來響應，殺了汧城（即汧縣，今陝西隴縣東南）的守將，叛軍勢力向西拓展到甘肅東部、陝西西部。

二、蓋吳分遣軍隊攻打臨晉（今陝西大荔縣南）以東的地區，[67] 意圖從東面攻打長安。

三、蓋吳自己率軍南攻李潤堡（今陝西蒲城縣東北）。李潤堡地位十分重要，後秦時在此設置鎮戍，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 (437)，更在此置華州。蓋吳從杏城起兵，已經控制了陝北和甘肅南部，如果再取得李潤堡，則其勢不可遏。後秦姚萇時的一個事件可作爲此一情勢的前車之鑑，當時魏褐飛率氐胡數萬人攻打杏城，雷惡地應之，攻打杏城之東的李潤堡；姚萇很憂慮，說「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吾有。」[68] 蓋吳從杏城起兵，進軍李

---

[64] 同前註，頁3922。

[65]《宋書》卷九五，〈索虜傳〉，頁2339-2341。

[66] 同前註，頁2339。

[67]《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蓋吳）分兵掠臨晉巴東。」《資治通鑑》胡注云：「『巴』當作『已』東」。（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頁3915。）

[68]《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頁2969。

潤堡，當地的羌人起兵響應，[69] 蓋吳遂據有此地，也就是說，長安東北部也在蓋吳的掌握之中。

四、蓋吳攻下李潤堡之後，又分派其部眾向西掠地至長安。

蓋吳以上的軍事活動都獲得勝利，雖然《魏書》記載前述的第二和第四項戰役，北魏軍隊大獲全勝：在蓋軍攻掠臨晉以東時，魏將章直大敗蓋吳的軍隊，蓋軍溺死於黃河的有三萬餘人。另外，蓋軍向西攻打長安時，將軍叔孫拔也獲勝績，斬殺三萬餘蓋軍。[70] 不過，唐長孺首先提出對這些記載的懷疑，認爲：事實上此時蓋軍是勝利的；其後，盧開萬、施光明也都持相同的看法。[71] 這應是正確的，因爲如果魏軍頻頻獲勝，太武帝就毋庸御駕親征了。

這一年的十一月，不僅蓋軍連連獲勝，蓋吳更指地爲名，自號「天台王」。[72] 同月，河東蜀族的薛永宗因爲泰州（治所在今河東蒲板）刺史周觀失政的緣故，起兵反叛，[73] 並且和蓋吳互通聲氣，「受其位號」；周觀討伐薛永宗，也未能成功。[74] 蓋吳的勢力可以說已經到達了河東地區，在此情況下，太武帝意識到事態嚴重，於是決定親自西行討伐。

---

[69]《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100云：太平眞君七年太武帝在返回平城的途中「（三月）車駕旋軫，幸洛水，分軍誅李潤叛羌。」

[70] 同前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99。

[71]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1；盧開萬，〈《魏書・陸俟傳》所載蓋吳之死辨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4(1982)：26-27；施光明，〈北魏蓋吳起義及其性質初探〉。

[72]《宋書》卷九五，〈索虜傳〉，頁2339：「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胡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諸戎夷普並響應，有眾十餘萬。燾聞反吳，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順，曰：『……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期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跡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

[73]《魏書》卷三〇，〈周觀傳〉，頁728：「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和，民薛永宗聚眾於汾曲以叛。」按：此「秦州刺史」，當作「泰州刺史」，泰州治河東蒲板。因泰州刺史周觀有失政之處，故河東汾陰人薛永宗起兵反叛。《魏書》中有多處「泰州」皆誤作「秦州」，可能是因「泰」和「秦」字形相近，傳抄錯誤所致。如《魏書》卷六一，〈薛安都傳〉云安都去世後，「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點校本校勘記〔二〕：「安都及其子生前曾任或死後追贈秦州刺史共五人，疑皆「泰州」之訛。泰州治河東蒲板，是薛氏本州，當時以官本州刺史爲榮，故祖孫多居此官。若是秦州，和薛氏毫無關係，便不可解。」（頁1377）

[74] 同前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99。

太武帝一面兵分三路，分別征討薛永宗、蓋吳和白廣平：殿中尚書、扶風公元處真和平陽公慕容嵩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率三萬騎征討蓋吳；西平公寇提率一萬騎討白廣平；[75] 另一方面，太武帝則是親自西征。

太武帝惟恐蓋吳、薛永宗相互連結，因此利用薛永宗同族人——河東蜀薛西祖系的薛初古拔在當地糾合宗人和鄉人，在黃河邊營築壘壁，阻斷二者往來交通之路。[76] 太平真君七年 (446) 正月，太武帝和他的軍隊抵達東雍州（今山西省臨汾市），包圍了薛永宗的營壘，大敗薛永宗，薛氏一門男女長幼都自沈於汾水，薛永宗的這支反叛軍便告敉平了。

二月，太武帝到達長安後，先到盩厔（今陝西周至縣東南終南鎮），殺了附從蓋吳的叛民耿青、孫溫二人的軍隊。又到陳倉，誅除在散關附從蓋吳的氐人。這個月，魏將乙拔等在杏城大破蓋吳軍，蓋吳遁走。[77] 三月，太武帝東還。不過，蓋吳的勢力仍在，五月，他回到了杏城，自稱「秦地王」，「假署山民」，聲勢又壯大起來了。

蓋吳改稱「秦地王」，是具有特殊意含的。太平真君七年二月，金城人邊冏、天水人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秦州州城上邽（今甘肅天水市）東城反叛，另外，有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人，也起兵響應。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討伐叛軍，擊殺了邊冏，但其餘眾仍推梁會爲主。五月，安豐公閭根和封敕文會同征討梁會，梁會走避漢中。在邊冏、梁會反叛期間，略陽人王元達趁機招引屠各、休官的族人，推舉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王元達爲略陽（今甘肅泰安縣東北）人，可能也是屠各或休官之族。封敕文的討伐軍到了略陽，而王元達等三千人屯聚松多川，五月，封敕文兵分三道攻擊，討平了這支反抗的軍隊。[78] 緊接著王元達敗亡後，蓋吳便自號「秦地王」，其目的可能是在招

---

[75] 同前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100；《資治通鑑》卷一二四，頁3915-3916。

[76] 《魏書》卷四二，〈薛辯傳〉，頁942；《資治通鑑》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頁3915。並請參見拙文，〈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待刊稿，初稿發表於：國史館主辦，「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1999年12月16-18日。）

[77] 《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100。

[78] 同前書，卷五一，〈封敕文傳〉，頁1135-1136：「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户，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眾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奠眞討之，軍次略陽，敕文遣使慰諭。而元達等三千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

引甘肅的氐、羌、休官、屠各之族。

蓋吳勢力復熾，太武帝派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一同討伐蓋吳。六月，更發定、相、冀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魏書》上說此舉是「以防越逸」，[79] 其實可能是戰事吃緊，所以不在渭北佈防，而是在渭南的終南山屯守。

關於此年七、八月時征討蓋吳戰事的發展，《魏書》並無記載，僅是突然記載了八月蓋吳之死；而《魏書》關於蓋吳之死的記載也不一致。〈世祖紀〉稱他爲下人所殺，〈陸俟傳〉則稱他爲其二叔所殺。雖然《資治通鑑》從〈陸俟傳〉之說，記載蓋吳爲其二叔所殺。不過，唐長孺認爲〈世祖紀〉有關蓋吳反叛的一些記載是值得懷疑的：如公元四四五年時「吳遂進軍李潤堡，分兵掠臨晉巴（已）東。將軍章直與戰，大敗之，兵溺死於河者三萬人。」這是《魏書》在誇耀其屠殺的行爲，實際上此時蓋吳在軍事上是勝利的，所以太武帝只好親征。至於蓋吳之死，唐長孺則從《宋書・索虜傳》：「屠各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之說，認爲蓋吳係在征討屠各時，中了流矢而死，北魏才能將其軍鎮壓下去。[80] 關於蓋吳之死，盧開萬有更詳細的討論，亦同唐長孺之說。[81]

蓋吳遽然死於戰陣，他的弟弟吾生率領部眾進入木面山，後來爲永昌王擊破討平。另外，高涼王那則擊破蓋吳的黨羽白廣平，並且生擒屠各路那羅，將他送到平城斬首。[82] 蓋吳反叛前後歷時一年，終告完全平息。不過，就在平定蓋吳的同一個月，在甘肅一支盧水胡反叛的煙硝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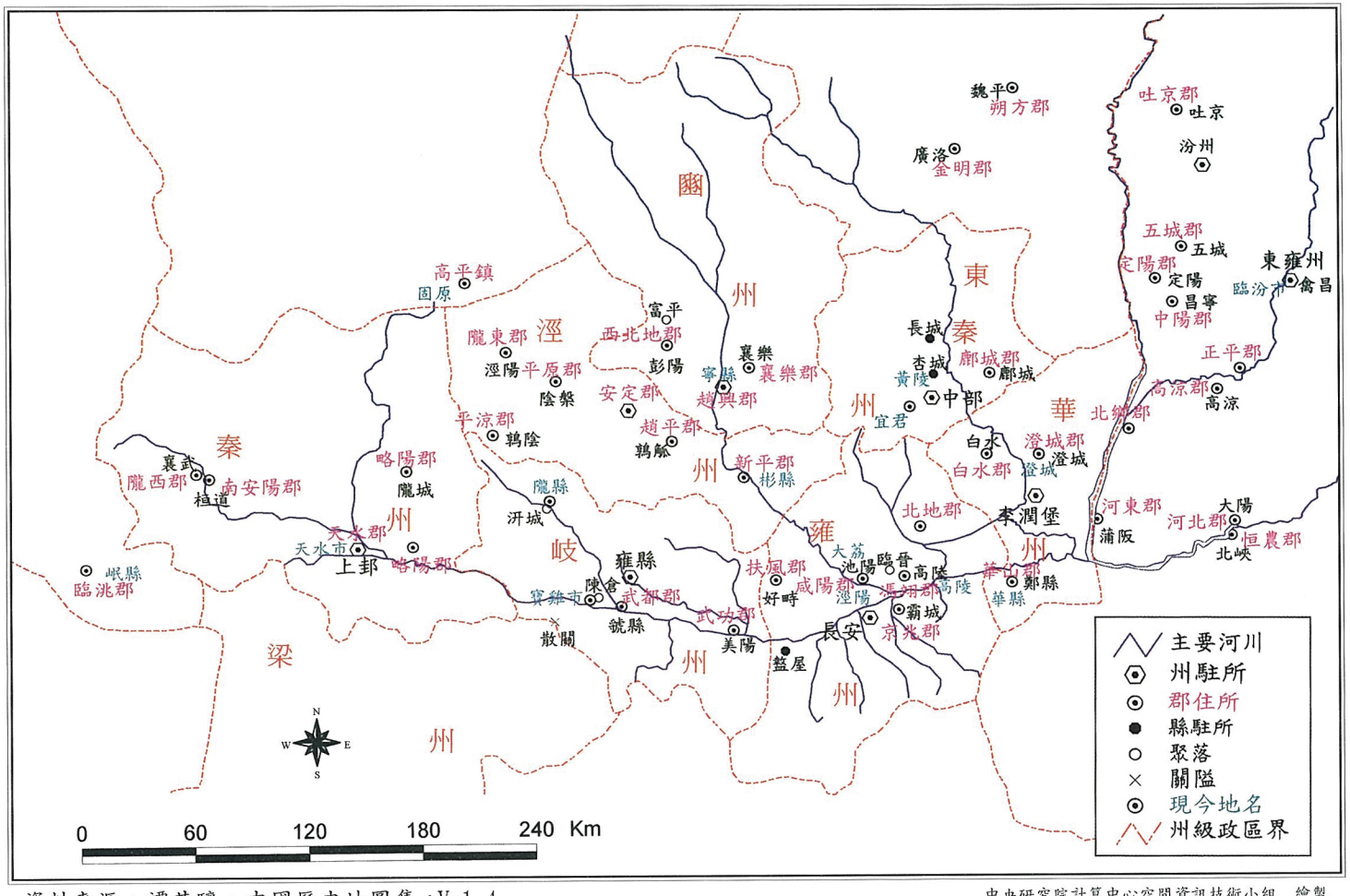
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邊冏、梁會、王元達事起和平定時間，從《資治通鑑》的記載，見：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頁3925-3926。

[79]《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101。

[80]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1。

[81] 盧開萬，〈《魏書・陸俟傳》所載蓋吳之死辨疑〉。

[82]《宋書》卷九五，〈索虜傳〉，頁2341；《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101。



資料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Vol.4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空間資訊技術小組　繪製

圖二：蓋吳叛軍活動範圍示意圖

四、蓋吳反叛中的滅佛宗教因素

前此研究太武滅佛，多從中華道統所繫的儒家、道教和佛教之爭來討論，而未曾從佛教信仰這個角度來思考。其實，蓋吳的反叛竟成爲滅佛的導火線，和盧水胡人的佛教信仰有相當的關連。不僅建立北涼政權的盧水胡沮渠氏是篤信佛教者，西走高昌延續北涼政權的沮渠安周仍然篤敬事佛，在杏城起兵反叛的盧水胡蓋吳也是信奉佛教的。此外，前此學者研究佛教的流傳與發展，往往以佛經的翻譯和主政者的提倡作爲主要標準，而較少注意到一般平民接受此一信仰的情況，本節也將就此做簡短的討論。

（一）非漢民族的佛教信仰

回顧中國佛教發展史，可以發現非漢民族曾經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非漢民族對佛教在中國的流佈，有相當的貢獻，一則早年的僧人大都不是漢人，二則一直要到五胡十六國時期後趙建武元年 (335)，氐人君主石虎方正式准許漢人出家。[83] 雖然早在漢代佛教就已經傳入中國，但當時只准許西域胡人立寺信奉；歷曹魏、西晉以迄後趙，也都不准漢人出家（當時也有出家者，但都屬於私度，而不是合法的）。因此之故，早年的僧人大都不是漢人，如東晉吏部尚書桓玄在和中書令王謐討論僧人是否應該向君主致敬的信函中，就指出：「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84] 又，五世紀時有一個人寫了一篇〈三破論〉，攻擊佛教是「破國、破家、破身」的宗教，其中便提到「今中國有奉佛之人，必是羌胡之種」。[85] 可知在四世紀以前，大多數的僧人都不是漢人；並且有許多非漢民族很早就接受佛教信仰。至後趙時，君主石虎因爲自身出於邊戎，故認爲「宜從本俗」，於是下令「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者，

---

[83]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卷一（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頁325。

[84]《弘明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卷十二，〈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頁81中。

[85] 同前書，卷八，頁51上。這篇文章現在已經亡佚了，但是著名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他後來出家，法名慧地），曾經寫了一篇〈滅惑論〉來反駁它。從此文中可以看到〈三破論〉部分的立論，其中便提到「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之人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之人，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悉聽餘有。」[86] 這是中國歷史上官方准許漢人出家之始。

非漢民族很早就信奉佛教，和他們居住的地區有密切的關係。如前所述，從漢朝以降河西一帶住著的許多不同的民族，而佛教從陸道經西域東傳，首及河西地區的敦煌，次經涼州（姑臧），而傳播到長安。因此，河西是最先接觸到佛教的地區之一。從《高僧傳》的一則記載，可知四世紀初年時，河西的非漢民族多已信奉佛教了。當時，原來在長安傳教的僧人帛遠，想遠走隴右（河西）躲避兵禍；因爲帛遠名高望重，秦州刺史張輔便想請他作僚佐，但帛遠志在方外而拒絕了。這使得張輔非常不悅，耿耿於懷，後來更藉故將帛遠處以鞭刑，以致於死。其時住在河西的羌胡，原先派了五千騎兵前來迎接帛遠，不料卻聽到他遇害的消息，都憤慨不已，要爲帛遠報仇。張輔後來派兵河西，羌胡率眾迎戰，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殺了張輔。[87]

至四世紀時，有更多的非漢民族信奉佛教了。後趙石虎性好殺戮，後來受到僧人佛圖澄的感化，而佛圖澄也常趁機救免人民，人們在他的教化下，多信奉佛教，而出現了「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的盛況。[88] 其後，關中在羌族出身的後秦君主姚興的鼓勵和支持下，不僅長安成爲佛經翻譯的重鎮，有五千多個外地僧人匯集此地，整個後秦的領地更是「事佛者十室而九」。[89] 由此可以推斷當時居住在關中的居民——包括大量的非漢族，也多是信仰佛教的。根據馬長壽的研究，從五世紀末年以迄六世紀中葉，關中地區主要建造佛碑像的人是漢族和羌族；另外，也有少數是氐人和西域胡人，而沒有新遷來的鮮卑人。[90]

這些非漢民族的信徒，還有出家爲僧尼者，《高僧傳》記載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有一位叫做曇翼的僧人，就是出身羌族的。[91] 同一時期，又有位叫做慧達的僧人，「本姓劉，名窣和。本咸陽東北三成定陽稽胡也。」[92] 可知他是一位居

---

[86]《廣弘明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卷六，〈辯惑篇〉第二之二，頁126中。

[87]《高僧傳》卷一，譯經上，〈帛遠傳〉，頁327上, 中。

[88] 同前書，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頁383下。

[89]《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

[90]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頁46-51。

[91]《高僧傳》卷五，義解二，〈釋曇翼傳〉，頁355下。

[92]《續高僧傳》卷二五，感通，〈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頁644下。關於慧達的籍貫事跡，《高僧傳》有一些不同的記載，卷十三，興福第八，〈釋慧達傳〉，頁409中云：

住在長安附近的匈奴族人。在六世紀此一地區的造像碑的題名中，也有羌族僧人的題名，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 (533)，在今陝西銅川市一個羌人「義邑」所建的造像碑銘中，就有羌人「沙彌夫蒙僧貴」的題名。[93] 又，西魏文帝大統五年 (539)，在陝西富平縣所造的石碑像上，也有四個焦姓沙彌、一個焦姓比丘的題名；[94] 焦氏是北朝的少數部族，也是富平縣的大族。[95]

（二）盧水胡北涼王族的佛教信仰

河西和佛教的淵源很早，在盧水胡北涼國主沮渠蒙遜大力推展佛教之前，此地的佛教已經相當盛行了。自魏晉以來，河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涼州，天竺和西域高僧東來，他們或駐錫在涼州，或路經此地到內地弘法，都對涼州一地佛教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中國僧人西行求法途經這裡，也對此地佛教有若干的影響。至少在西晉時期，此地已有不少人是信奉佛教的。在五世紀以前，在涼州就翻譯出許多佛教經典，還產生許多著名的譯經高僧和弘法大師。[96] 公元四〇一年，北涼沮渠蒙遜以張掖爲都城，開始獎勵譯經工作。公元四一二年，沮渠蒙遜遷都涼州（姑臧）之後，由於沮渠家族對佛教的推展，更使得涼州成爲北方僅次於長安的譯經中心。湯用彤甚至認爲「北涼沮渠氏，本可謂爲佛法之國家。」[97]

居住在安定的盧水胡人可能早就信奉佛教，佛教是沮渠王族的家族信仰，因此之故，北涼君主都甚爲崇信、獎勵佛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釋慧達，姓劉，本名薩河。幷州西河離石人。」根據饒宗頤的研究，慧達（俗名劉薩訶）的事跡以道宣《續高僧傳》所記，最爲可信。見：饒宗頤，〈劉薩訶事跡與瑞像圖〉，《1987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93]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附錄一〈關中北魏北周隋初未著錄的羌村十種造像碑銘〉，（四）邑主雋蒙□娥合邑子三十一人等造像記〉，頁91。

[94]《金石萃編》卷三二，頁十四，〈曹續生造像記〉。

[95]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頁47。

[96] 張學榮、何靜珍，〈論涼州佛教及沮渠蒙遜的崇佛尊儒〉，《敦煌研究》1994.2：98-101。關於通過涼州東來傳教的外地僧人、中土僧人西行求法途經涼州者、五涼僧人活動，可參見陸慶夫，〈五涼佛教及其東傳〉，《敦煌學輯刊》1994.1：10-15，表1至表3。

[97] 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頁489。

（一）沮渠蒙遜在位期間，崇敬曇無讖、玄高等高僧，在涼州展開大規模的譯經活動，並且開鑿武威天梯山石窟，建造宏偉富麗的寺院。高僉之撰《涼書》記沮渠「國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98] 從公元四一二年以迄於公元四三九年之間，北涼有四次大規模的譯經活動，共譯出佛經八十二部、三百一十一卷，其中包括對中國佛教影響很大的《大般涅槃經》、《大毗婆娑經》等。前兩次是在蒙遜主政時期，第三次係在四二六年由沮渠蒙遜世子興國主持的，第四次是在沮渠牧犍在位時。[99]

（二）沮渠蒙遜甚至將他的一個兒子取了一個佛教化的名字「菩提」，公元四二九年，因世子興國在和西秦乞伏氏的戰爭中被俘，乃以菩提爲世子。[100]

（三）沮渠蒙遜的堂弟安陽侯沮渠京聲，更曾西行求法，在于闐從天竺法師佛馱斯那學習《禪秘要治病經》梵本，又在高昌得到觀世音、彌勒二觀經梵本，帶回姑臧，並譯出《禪要經》。北魏平姑臧以後，他就到南方劉宋境內，繼續從事譯經的工作。[101]

（四）公元四三二年沮渠蒙遜去世，因世子菩提年幼，眾人乃推其第三子牧犍（或作茂虔）繼位。牧犍對佛教的熱誠不減其父，在公元四二〇至四二三年之間，沮渠牧犍擔任酒泉太守時，曾起建浮圖、建造佛像。[102] 及他繼位爲涼王時，在公元四三七年（北涼永和五年）到公元四三九年（永和七年），親自主持了北涼第四次的譯經，譯出《大毗婆娑經》。姑臧陷落後，沮渠牧犍和大部分的王族都被遷到平城，由於他對佛教的崇信，可能在遷居平城之後，仍然和同被遷徙的涼州僧人有所來往。

總之，由於沮渠蒙遜父子對佛教的提倡和鼓勵，使得河西佛教更爲興盛流行。公元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北魏軍臨姑臧城下時，登城幫助防守的僧人就有三千人，由此可見當時涼州佛教之盛、僧人數目之多，可能較沮渠蒙遜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103] 又，迄今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武威和新疆

---

[98]《廣弘明集》卷七，〈列代王臣滯惑解下〉，涼高道讓，頁133上。

[99] 張學榮、何靜珍，〈論涼州佛教及沮渠蒙遜的崇佛尊儒〉，頁102。

[100]《宋書》卷九八，〈氐胡・大且渠蒙遜傳〉，頁2415。

[101]《高僧傳》卷二，譯經上，〈曇無讖傳〉，頁337上。

[102]《太平御覽》卷一二四，〈偏霸部〉八，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沮渠茂）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

[103] 殷光明，〈北涼石塔分期試論〉，《敦煌研究》1997.3：89-90。

的吐魯番共出土了十四座北涼石塔，[104] 也可以顯示出當時北涼民間佛教信仰的流行。

（五）姑臧淪陷後，沮渠蒙遜的另外兩個兒子：無諱和安周西走高昌，並且在那裡延續著北涼政權，沮渠安周同時也繼承了北涼的佛教政策，譯經、造寺、寫經、開鑿石窟，而在民間也沿襲涼州時期建造石塔（北涼石塔）的風氣，對高昌一地佛教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105] 公元四四五年九月，盧水胡人蓋吳在杏城起兵反抗北魏的統治時；在高昌的涼王沮渠安周正從事規模宏大王家寺院的建造（445年九月動工，至449年方完工），並且刻石記事，即著名的〈且渠安周造寺碑〉。[106]

（三）涼州僧人

由於太武帝在親自攻打北涼都城姑臧的戰役中，曾遭遇到涼州僧人的「抵抗」，因此，太武帝對涼州僧人一開始便懷有疑忌。其後，他對涼州僧人仍是不放心，顯示在他誅殺兩個涼州高僧玄高、慧崇，以及賜死沮渠昭儀這兩個事件上。

五世紀以來，由於盧水胡沮渠王族的提倡佛教，河西佛教甚爲昌盛，多數的平民皈依奉佛，當時此地有大批僧人——其中出了不少高僧，他們有的留在本地佈教，也有部分僧人或東向北魏、或向南朝傳教，對佛教的流傳與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107]

公元四三九年八月，北魏太武帝親自攻打北涼都城姑臧時，有三千名僧人登上姑臧城，幫助北涼防守。據《續高僧傳》的記載，這是因爲當時城中人少，故

---

[104] 同前文，頁84-85。

[105] 姚崇新，〈北涼王族與高昌佛教〉，《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

[106] 池田溫著、謝重光譯，〈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學輯刊》1988.1/2；賈應逸，〈"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與北涼高昌佛教〉，《西域研究》1995.2；姚崇新，〈北涼王族與高昌佛教〉；榮新江，〈"且渠安周碑"與高昌大涼政權〉。
〈安周碑〉：「□□（大涼）承平三年歲次大梁，月呂乏射，量功興造。」按月呂乏射，指季秋九月。見榮新江，〈"且渠安周碑"與高昌大涼政權〉，頁75。

[107] 陸慶夫，〈五涼佛教及其東傳〉，《敦煌學輯刊》1994.1：13-16。

僧人被逼迫爲兵；[108] 然而，僧人的抗戰可能給太武帝惡劣的印象。[109] 因此在魏軍攻下姑臧後，太武帝一度下令處死登城守備的三千名僧人，幸而，道士寇謙之和太武帝之弟赤堅王認爲這些僧人是被逼迫的，特別爲他們求情；後來太武帝雖然饒這些僧人不死，但仍然將他們「虜掠散配徒役」。[110]

魏軍攻下姑臧後，太武帝將涼州臣民三萬家遷到平城，其中就有不少僧人。《魏書・釋老志》云「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涼州城內僅登城拒戰的沙門就有三千人，而隨同其國人遷來平城的數目當超過此數。雖然《續高僧傳》說登城拒守的僧人是被逼迫的，但也有可能由於北涼王室對佛教的提倡和重視，使得某些僧人對北涼政權有某種程度的忠誠。這些僧眾既有「前科」，而在北魏將涼州僧人遷到平城的途中，又有一些僧人如僧朗等人趁機逃走，對北魏政府採取不合作的態度，[111] 更增添太武帝對這一批遷到平城涼州僧人的疑忌。

太武帝對涼州僧人疑忌的具體化，首先在太平真君五年 (444) 九月誅殺了涼州高僧玄高、慧崇。玄高是五世紀中涼州著名的僧人，有很多的追隨者，他早年隱居在麥積山時，就有一百餘名僧人從他修禪問學。公元四一二年至四二七年之間，他到西秦（鮮卑乞伏氏在隴西建立的政權，也被稱爲「河南國」）境內，追隨一位外國禪師曇無毗學習禪法。當時曇無毗「領徒立眾，教以禪道」，擁有不少弟子；不久，曇無毗就返回舍夷國，而玄高仍留在隴西，當時有兩位西秦僧人向西秦國主乞伏熾磐的世子曼，告發玄高「畜聚徒眾，將爲國災。」熾磐遂將玄高貶逐到黃河之北的林陽堂山，當時他仍然有「徒眾三百」隨行。[112] 玄高的修爲德行，以及他對僧人信徒的吸引力，使得他經常擁有一大批的追隨者，這或許也是造成他日後爲太武帝誅殺的原因之一。

太延五年魏軍平姑臧後，玄高也被遷徙到平城，太子拓跋晃拜他爲師；另一位被遷到平城的涼州僧人慧崇，也成爲尚書韓萬德之師。太平真君五年九月，玄

---

[108]《續高僧傳》卷二五，感通上，〈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頁646下：「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塚本善隆認爲這些僧人是自願加入抗戰的軍隊，見〈北魏太武帝の廢佛毀釋〉，頁57。

[109] 塚本善隆，〈北魏太武帝の廢佛毀釋〉，頁58。

[110]《續高僧傳》卷二五，感通上，〈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頁646下。

[111] 同前註：「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

[112]《高僧傳》卷十一，〈釋玄高傳〉，頁397上，中。

高和慧崇同時被殺，據《高僧傳》的記載，玄高係涉及北魏朝廷的政爭；也就是他爲太子做「金光明懺」，以祛除太武帝對太子的疑忌之事，後來此事爲太武帝所知曉，而爲他惹來了殺身之禍。[113] 從《魏書》的記載看來，太平真君四年(443) 征討蠕蠕之役後，太子晃「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而同時崔浩和宜都王穆壽也參輔政事，然而，太子晃和崔浩在好幾件事情上意見相左，兩人之間有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114] 不過，如果玄高只是因爲太子晃作懺之事而見殺，則不致於連慧崇也遭禍。本文認爲：玄高、慧崇二人被殺的根本原因，在於太武帝對涼州僧人的疑忌，這也是他日後滅佛一個潛在的因素。然而，在太武滅佛的過程中，涼州僧人也仍然發揮著作用，玄高的弟子太子晃有意的預警和緩宣詔書，大大地減輕了佛教僧人和經典所遭受到的壓迫和損壞。

其次，太武帝對涼州僧人的疑慮，也反應在太平真君八年 (447) 賜死沮渠昭儀的事件上。[115] 沮渠昭儀被賜死的罪名，是她曾從和北涼王室有很深淵源的僧人曇無讖習法。關於沮渠昭儀之死，將留待第五節中討論。

（四）陝西盧水胡的佛教信仰

蓋吳是杏城人（今陝西黃陵縣），而從當地現存一些石窟上的題記，可知在北朝以前住居此地的非漢民族——包括盧水胡，大都篤信佛教，並且在此地造像和建造石窟。

在陝西省黃陵縣有北朝所開鑿的香坊石窟，從窟內中央龕左側的供養人題記，可知這是一個蓋姓家族所開鑿的石窟。蓋氏是當地北朝以來的盧水胡姓氏，在石窟左壁外側淺浮雕四個男供養人像，也都是胡服打扮。[116] 另外，一九七八

---

113 同前註，頁397下。

114 在人事權上，二人頗有不同的意見，如《魏書》卷四六〈李訢傳〉記載崔浩被詔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太子晃因爲受高祐和尚書段霸兒姪等影響，認爲崔浩在此事上偏用其親人，而向太武帝告狀。（頁1039）又，同書卷四八〈高允傳〉記載：崔浩推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之事，太子晃就很不同意；太子認爲先前從州郡徵召來的人在京任職已久，有勤勞之功，應先將這些人補爲郡守，而以新召者遞補其郎吏的缺。不過，此事因崔浩的堅持，而從崔氏之議。（頁1069）

115 賜死沮渠昭儀的時間，從《資治通鑑》卷一二五，〈宋紀〉，文帝元嘉二十四年，頁3930-3931。

116 靳之林，〈陝北發現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4：62。

年在黃陵縣雙龍公社西峪村發現西魏大統十四年 (548) 的「似先難及造像碑」，此碑上的造像記多殘，但可見廿九人的題名，可知造像者主要是「似先」和「蓋」姓人氏，[117] 似先是西羌的姓氏，[118] 當地盧水胡蓋氏是篤信佛教者，殆無可疑，而居住在此一地區的羌人可能也多信奉佛教。

又，在黃陵縣西南的宜君縣的福地水庫石窟，開鑿於西魏文帝大統元年 (535)，其中央龕的題記有「像主撫軍將軍石保合」，「王洛生騎馬時」「化主蓋□生」以及「香火」、「典錄」等義邑組織的執事職銜，[119] 王氏可以是漢姓，但它同時也是羌人鉗耳改漢姓後的姓氏。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由盧水胡蓋氏和漢人、或是羌人共同組織的義邑所開鑿的石窟。[120] 另外，此地的盧水胡人早在六世紀初年即已建造石碑像，可見其佛教信仰之深刻。在陝西長武縣出土的一批佛教造像碑中，最早的是北魏永平二年 (509) 的成愿德造像碑，在此碑的碑座中間所刻的供養人像，三個男供養人頭戴帽，身穿窄袖短襦；三個女供養人像上身穿窄袖短襦，下身著長裙，都是胡服裝束。另一個出土在長武縣昭仁寺的北魏造像碑，上面所刻的供養人像也是胡服裝扮。[121]

總之，公元四四五年九月以迄四四六年八月，從河西、陝北、關中到河東，這些響應蓋吳反叛的地區有著眾多的佛教信徒；而盧水胡蓋氏也是敬事佛教的。

（五）佛教的社會勢力

盧水胡的佛教信仰可能是太武滅佛因素之一。嚴耀中指出：「滅佛的導火線與蓋吳起義有關，……表明佛寺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廣泛的政治聯繫，還可能擁有武力。但根本的原因還是：佛教在北土流行後『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122]

---

[117] 靳之林，〈延安地區發現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與文物》1984.5：45。

[118] 陝西耀縣藥王山博物館、陝西臨潼市博物館、北京逯金城博物館，《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張燕〈序言〉。

[119] 靳之林，〈陝北發現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頁64。

[120] 氐族也有王姓者，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318-319。

[121] 陝西省文物保管所、長武縣文管所，〈陝西省長武縣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3：51-52。

[122] 嚴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頁210-211。

佛教有什麼可令主政者畏怖的？簡單地說，就是它代表一種社會勢力，有時候甚至是一種經濟勢力。由於僧人擁有眾多的信徒，而具有組織信徒的管道和能力；同時，部分寺院或個別僧人也具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使得僧人成爲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經濟勢力。有些僧人或者寺院就擁有不少的財富，如三世紀下半葉，在長安弘法的僧人竺法護，就是「資財殷富」；當時長安一個有名望的家族，決定信仰佛教，想試試竺法護的道德如何，於是假裝急難，向竺法護借錢二十萬，以爲試探。[123] 又，著名的僧人往往有很多僧人追隨——甚至多達數百人，從他們問學或修習禪法，加上他們有數目龐大的俗家信徒，隱然成爲一種社會勢力。

除了高僧大德之外，一般僧人的影響力也是不可忽視的。《魏書・釋老志》記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教，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其實，太宗明元帝 (409-423) 這道詔令是利用佛教來綏服民心，[124] 但同時也更進一步促進了佛教的廣爲流佈，深入民間。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明元帝之前，拓跋氏政權就已經採用此法來收服被征服地區的人心，故前文云「仍令沙門敷導民俗」。這些受命「敷導民俗」的僧人，主要是在都市的平民階層和鄉村地區從事傳教活動；他們經常領導信徒，組織以俗人爲主體的信仰團體，稱爲「義邑」或「法義」，而自身則成爲這種團體的指導者，稱爲「邑師」。這種佛教信徒組織的成員稱爲「邑義」或「法義」，人數從數十人，甚至多達數百人，其活動包括營造佛像、石窟，舉行齋會、寫經、誦經，或者是修橋補路，造井，建立義塚，施食給貧民等。[125] 迄今所知最早的義邑資料，係見於佛教造像碑上的銘記，最早是太平真君元年 (440) 三月，邑義道繼等人建造佛像碑。[126] 次則是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483)，義邑成員分別在龍門和雲岡石窟造像。[127]

---

[123]《高僧傳》卷四，義解一，〈竺法乘傳〉，頁347中。

[124]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頁21-22。

[125] 山崎宏，〈隋唐時代に於ける義邑及法社〉，收入：氏著，《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東京：清水書房，1974年再版），頁767-768。並見拙著，〈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5.4(1994)。

[126] 羅振玉，《海外貞珉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九四），頁3，總頁114：「合邑義道繼等造象，石藏美國克利夫蘭特美術博物館」。方若著，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頁227。

至於陝西地區，截至目前爲止最早的義邑造像，是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 (505) 的馮神育佛道造像碑，[128] 佛教義邑組織在關中出現的時間可能比這個年代更早。從關中一帶六世紀的義邑造像碑的題記，可知有些義邑參與的信徒人數有一、二百人，這不僅顯示出僧人的組織動員能力，也可知僧人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

佛教徒的聚會使得當政者感到相當不安，北魏孝文帝時，孫淵在其所上的表中，對佛教徒的聚會有如下的形容：「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眾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爲甚。」[129]

就北魏對佛教的政策來說，和其實際的利益有關。北魏在建國初期，曾經以佛教作爲一種綏服被征服地區民心的懷柔政策。道武帝拓跋珪在經略山西、河北時，因爲這些地方是佛教興盛的區域，曾利用佛教信仰來收撫民心；到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時代，依舊承襲此一政策「仍令沙門敷導民俗」。[130] 但至五世紀中，逐漸消滅各割據勢力之後，便開始對佛寺僧人的社會勢力存有疑慮，乃至於「每疑沙門爲賊」，收執僧人訊問，甚或誅殺。[131]

從整個北魏時代十件「佛教匪」的叛亂，顯示在佛教信仰普及的社會，佛教教團是佛教匪聚結的紐帶。[132] 雖然蓋吳的叛變不是一件佛教匪的叛亂，然而，北魏對關隴地區的各民族原已不放心，加上他們有佛教信仰作爲共同的基礎，或發展成一種團結的紐帶，這使得太武帝對佛教懷有戒心。因此，當他的侍從在長安寺院中發現兵器時，他便不免懷疑是寺院僧人和蓋吳通謀。就此而言，太武帝的滅佛實有切斷蓋吳叛亂時，各民族間的共同的基礎——佛教信仰，以及藉著它所發揮組織和連繫的作用。

---

[127] 雲岡石窟第11窟東壁「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廟形像九十五軀」。另外，龍門古陽洞中，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是一個以邑主中散大夫潁川太守孫道務爲首的義邑所造的，它完成的時間在景明三年五月七日。（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彫塑篇》〔東京：佛書刊行會，1915〕，頁192-193。）

[128]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張燕〈序言〉。

[129] 《魏書》卷四七，〈盧玄傳附盧淵傳〉，頁1048。

[130]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頁17-24。

[131] 《續高僧傳》卷二三，〈魏滎陽沙門釋超達傳〉，頁644中，下：「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究窮劾，達以實告，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又，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釋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爲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期斬決。」

[132] 塚本善隆，〈北魏の佛教匪〉，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頁181。

五、太武滅佛與滅佛的後續

從太武滅佛之前的一些事件，到蓋吳反叛中引發了全面滅佛的行動，以及滅佛後一連串誅殺沮渠王族的事件，顯示太武滅佛和盧水胡族及其佛教信仰有相當的關連。

（一）滅佛的先聲

在全面滅佛之前，太武帝就有一些壓制佛教的措施。作爲滅佛前奏的第一道詔令，是太延四年 (438) 三月癸未，太武帝下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雖然《魏書・釋老志》記載罷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之事，是在北魏平姑臧以後的事，[133] 但是由於〈世祖紀〉清楚記載發佈此一詔令的年月，《資治通鑑》也遵循此說；胡三省認爲太武帝此詔是爲了增廣兵源之故，[134] 塚本善隆則指出此係爲次年討伐北涼所作的準備。[135]

太平真君五年 (444) 正月戊申，太武帝發佈「禁養師巫詔」，則顯示其對僧人——特別是涼州僧人的猜防：

> 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136]

太延五年，太武帝攻下北涼都城姑臧，遷徙其吏民三萬戶至涼州，其中就包括許多僧人，《魏書・釋老志》形容「沙門佛事皆俱東」。前面已提及：五世紀以來涼州爲一佛教中心，高僧輩出，因此東遷至平城的僧人，多爲平城佛教徒景慕師事，如太子晃拜涼州僧人玄高爲師，尚書韓萬德尊事慧崇爲師。此外，被強迫遷移到平城三萬戶的涼州吏民——包括北涼王族，也大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亦是涼州僧人的弟子，亡國失土的涼州臣民和對盧水胡政權有好感的涼州僧人，亟有可能在異鄉的平城，藉著共同的信仰，從事若干宗教活動。太武帝原來就對被

---

[133]《魏書・釋老志》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眾多，詔罷年五十已下者。」

[134]《資治通鑑》卷一二三，文帝元嘉十五年，頁3867：「以其強壯，罷使爲民，以從征役。」

[135] 塚本善隆，〈北魏太武帝の廢佛毀釋〉，頁57。

[136]《魏書》卷四下，〈太祖紀下〉，頁97。這段文字也出現在同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頁3034，係誤植至太平眞君七年的滅佛敘述中。

遷到平城的涼州僧人有所疑忌，因此，禁止所有的人「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的私養師巫沙門，其中有很大的成份是衝著涼州僧人而來的。

至於不准養「金銀工巧之人」在家，主要是針對著佛像的製作而言。這一點可以和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滅佛時，同時「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於京師」之事，[137] 前後相互呼應。從北朝以來，有許多的佛像是僧俗信徒共同出資建造的，他們通常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邑師領導下，組成「義邑」或「法義」的信仰團體，以建造佛像。在很多造像記中，都敘述了他們如何共同出資，「採石他山，遠訪名匠」，以完成佛像或石碑像的建造。因此，無論是禁止所有的人私養工匠，或者是將長安城的工匠集體遷到平城，都是防止佛教徒藉著建造佛像，以相互連結的一個政策。

作爲滅佛先聲的第三件事，是在「禁養師巫」詔發佈九個月之後，太武帝下令處死兩位德高望重的涼州僧人玄高和慧崇。據《高僧傳・玄高傳》記載，玄高事先就預料到自己會遭到禍害：「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138] 玄高何以會有這種預感？他可能深切體會到北魏對於東遷的涼州吏民及其宗教信仰的猜防。上文提及北涼在沮渠蒙遜、沮渠牧犍的統治下，大興佛教，沮渠王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其臣民也多篤信佛教。此時，遜位的涼王沮渠牧犍和信奉佛教的故臣民三萬戶都被遷到平城，涼州高僧玄高等人自然成爲他們的精神領袖。然而，促使太武帝誅殺名高望重的玄高和慧崇，也可能和這一年（太平真君五年）七月，北涼王族的東雍州刺史沮渠秉（沮渠蒙遜之子）的反叛有關，使太武帝對於從姑臧遷來的人更多了幾分猜防。同時，遠走高昌立國的沮渠安周，正帶著一批前涼州臣民和僧人，在那裡延續著北涼政權，並且承繼北涼王室提倡佛教的傳統，在那裡造寺、造像、寫經、翻譯佛教經典。在此情況下，太武帝惟恐亡國失土的北涼君臣有共同的聯繫和依託，蔚爲一種勢力，因此下令處死涼州高僧。

（二）全面滅佛的詔令

太平真君七年 (446) 春天，太武帝親征蓋吳時，引爆了全面滅佛的行動。

---

[137] 同前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100。

[138]《高僧傳》卷十一，〈釋玄高傳〉，頁398上。

太武帝的隨從無意中在長安的一所寺院中發現兵器，基於盧水胡人一向是佛教信徒這個認識，以及佛教徒早就有組織義邑的傳統，導引太武帝猜疑寺院僧人和蓋吳通謀：「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後來進一步清查寺院時，更查出寺院中財產富裕，並且有很多州、郡官員和富人寄放的財物，[139] 又顯示了寺院和官府、富人豪族有密切的連繫。同時，也發現了寺院僧人有不檢點的行爲「又爲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140] 關於這一點的真實性，有待存疑，《資治通鑑》記載太武滅佛事件中並未提及此事。太武滅佛是否藉著給長安僧人冠以淫邪的罪名，而使得其全面滅佛的措施更具合理性？不得而知。當時，信奉道教的崔浩也隨同出征，據說他趁機進言，太武帝遂下令全面滅佛。崔浩在此間扮演的角色如何，是很難判斷的，因爲在這決策的過程中，做爲當時道教領袖的寇謙之是持反對的態度的。[141]

關於全面廢佛詔令是此年二月、或三月發出的，史家有不同的意見；本文以爲：二月時太武帝首先在長安一地實施滅佛毀法，但是透過在平城監國的太子晃發佈全國性的毀佛詔令，時已屆三月了。太武帝首先下令毀滅長安的佛教，《魏書・釋老志》稱：

> 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留臺即指留在平城監國的太子晃。[142] 也就是說，太武帝在長安先行誅殺當地的沙門，開始毀佛的行動，然後下令留守在平城的太子對全國發佈滅佛的詔令。前文已提及太子晃師事涼州的僧人玄高，做爲一個佛教徒，他自然是反對毀廢佛法的。對於來自長安太武帝這個指令，太子是先努力陳情，力圖挽回，但沒能成功；在無可奈何之餘，他也只能在其職權內，做一些補救的措施，《魏書・釋老志》云：

> 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

---

[139]《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頁3033-3034。

[140] 同前註。

[141]《資治通鑑》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頁3923：「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之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幷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

[142] 同前書，卷一二四，〈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胡注：「魏王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爲留臺。」頁3923。並見：塚本善隆，《魏書釋老志の研究》，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一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第二〈譯注篇〉，頁185-186。

> 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司宣告徙征鎮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之，得各爲計。

上文云太子「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所指的即是二月時太武帝在長安誅殺僧人之事。《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云：「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太武帝名燾，字佛狸；「討羯胡於長安」即指他親征蓋吳之事。由上可知，太子晃上表陳諫殺沙門之濫，是在太武帝於長安的雷厲風行毀法之後。又，平城和長安往來陳情和回覆的信函，需費時日，太子又曾再三向太武帝陳情；當太子晃終於領悟到太武帝滅佛的決心時，也刻意「緩宣詔書」。由此推算，留守在平城監國的太子晃對全國發佈滅佛令時，當已屆三月了。無論是〈釋老志〉或是《魏書・世祖紀》，所記載的都是從平城所發佈、範圍遍及全國的滅佛令。〈世祖紀〉云：

> 三月，詔諸州坑門，毀諸經像。徙長安工巧二千餘家於京師。車駕旋軫。

這一年三月，在平城監國的太子晃發出全國性的滅佛令，但因他有意維護佛教，特地緩宣詔書和預先示警，因此長安以外的僧人和佛典，尚得以保全，《魏書・釋老志》云：

> 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像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在全國性的滅佛令發佈的前後，太武帝才從長安啓駕回鑾，四月甲申，方抵達都城平城。[143]

（三）滅佛的後續：太武帝的誅殺沮渠宗室

太平真君八年 (447) 正月以後，太武帝一連串誅殺沮渠王族的事件，可以視爲蓋吳之亂的餘波盪漾，也可以說是滅佛的後續。

從太平真君五年以後，盧水胡人接二連三的反叛，蓋吳叛軍規模又空前龐大，使得太武帝對盧水胡人疑慮甚深；然而，太平真君七年八月，蓋吳反叛剛平

---

[143]《魏書》卷四，〈世祖紀下〉，頁101：「夏四月甲申，車駕至自長安。」其實，這一年二月太武帝在長安有一番滅佛的行動之後，他又去了長安以西的盩厔、陳倉、大散關，再東返雍城、長安，從長安動身回平城。〈世祖紀下〉，頁100。

定；同月，安定（治所在今甘肅涇川縣涇河北岸）盧水胡劉超又起兵反魏，眾至萬餘人。[144] 關隴盧水胡再度反叛的消息傳來，使得太武帝深深感到自身的危險。當時，平城內外住著很多遷自姑臧的北涼遺民（包括北涼的遜王沮渠牧犍和一些王族），其中有一部分是盧水胡人，加上太平真君五年北涼王族沮渠秉和薛安都共同謀反的記憶猶新，這可能使得太武帝感到芒刺在背。因此，從太平真君八年正月開始，太武帝便展開誅殺沮渠王室的行動，直到正平二年 (452)，所有東遷的沮渠王族都被趕盡殺絕爲止。

太平真君八年正月，太武帝首先賜死在自己身邊的沮渠昭儀，以及除了沮渠牧犍、沮渠萬年、沮渠祖之外所有的沮渠王族。沮渠昭儀是沮渠蒙遜的女兒，牧犍之妹，太武帝延和二年 (433) 四月，太武帝爲了和北涼通好，迎娶沮渠氏，拜爲右昭儀。太平真君八年，由於沮渠牧犍的親信告發沮渠牧犍父子兩項罪名：一是私藏北涼府庫之物，二是牧犍父子多藏毒物，前後殺人百數，其姐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太武帝「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145]

沮渠昭儀的死，其實涉及在涼州活動的僧人曇無讖。曇無讖是罽賓沙門，先後在鄯善和涼州傳教，他到了涼州之後，沮渠蒙遜甚爲敬重他，命他主持譯經，譯出《涅槃經》等對後世影響很大的經典。太武帝久聞其名，派遣李順出使涼州，要求沮渠蒙遜將曇無讖送到平城，但沮渠蒙遜恐他爲太武帝所用，欲留而不遣，又恐太武帝責怪，就派人殺了曇無讖。[146] 太平真君八年沮渠昭儀卻因爲曾從曇無讖受法這個罪名，而被賜死，《魏書》云：

> 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至此，帝始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147]

---

[144]《魏書》卷四〇，〈陸俟傳〉：「安定盧水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未說明是何年，《資治通鑑》卷一二四，則將之繫於四四六年八月：「會安定盧水胡劉超聚眾萬人反，魏主以（陸）俟威恩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以平之。」頁3928。

[145]《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附子牧犍傳〉，頁2208-2209。

[146] 魏太武帝徵曇無讖的時間，據《魏書・釋老志》云是在太武帝神䴥中 (428-431)；《資治通鑑》則將之繫在太武帝延和元年 (432)，見該書卷一二二，〈宋紀四〉，文帝元嘉九年，頁3845。

[147]《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附子牧犍傳〉，頁2208-2209。

當時，曇無讖早已去世達十餘年之久，沮渠昭儀的死還牽扯到這位和北涼王室有很深淵源的僧人，不可說不怪。又，太武帝除了賜死沮渠昭儀之外，並且誅殺了除了遜王沮渠牧犍和沮渠萬年、沮渠祖之外所有的沮渠王族，更令人可疑。

在這一次誅殺沮渠宗族時，並沒有包括上述三位沮渠王族，主要的原因是在太武帝攻姑臧之役時，沮渠萬年、沮渠祖二人先行投降魏軍，故太武帝對他們猜疑的程度較少。而遜位的涼王沮渠牧犍之所以能暫免一死，則因他是太武帝妹婿的緣故。太延三年 (437)，太武帝將其妹武威公主嫁與涼王沮渠牧犍，這顯然是一項政治婚姻；早先沮渠牧犍已娶西涼國主李暠之女爲后，及武威公主到姑臧時，李后乃遷居酒泉，不久就去世了。[148] 太武帝攻打北涼時，武威公主是站在其兄這一邊的，《魏書》云涼州之役「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149] 太武帝可能因爲武威公主的緣故，所以延遲誅殺沮渠牧犍的時間。

不過，在此年三月，遜位的涼王沮渠牧犍終究難逃一死，「人又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150] 據《魏書》記載，「牧犍與公主訣，良久乃自裁」，[151] 由此可見公主和牧犍可能感情甚篤。沮渠牧犍死後，武威公主又另嫁李惠（獻文帝李夫人父，李夫人生孝文帝）；然而，在她去世之後，卻是和沮渠牧犍合葬。[152]

至太武帝正平二年 (452) 正月，碩果僅存的北涼王族沮渠萬年、沮渠祖同時被賜死，理由是和叛民通謀。《魏書》卷四，〈世祖紀下〉：「（正平）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民五千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民通謀，賜死。」被安置在中山郡（治所在盧奴縣——今河北定縣）的南方降附人民五千家謀反，冀州（治所在信都縣——今河北冀縣）州軍討平此亂，然而做爲冀州刺史的沮渠萬年卻被指爲「和降民通謀」，而被處死，這是頗令人感到疑惑的。又，在這個事件中，似乎和此事件沒有關連的沮渠祖也一併被賜死。「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公；祖，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

---

[148]《資治通鑑》卷一二三，〈宋紀五〉，文帝元嘉十四年，頁3866。

[149]《魏書》卷八三上，〈李惠傳〉，頁1824：「李惠，中山人也。思皇后之父也。……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

[150] 同前註。

[151]《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附子牧犍傳〉，頁2209。

[152] 同前書，卷八三上，〈李惠傳〉，頁1824。

刺史，復坐謀逆，與祖俱死。」[153] 可見太武帝是有意趕盡殺絕沮渠王族。

無論沮渠王族是因「與故臣民謀逆」，或是和「南方降民通謀」的罪名，而遭到賜死的命運，盧水胡的沮渠王族至此全部完結，只留下沮渠安周在遙遠的高昌，延續著北涼的政權，以及北涼王室的佛教信仰和政策。

就在太武帝誅殺最後的兩位北涼王族之後，這一年 (452) 二月甲寅日，太武帝爲其內侍宗愛所弒；經過短暫政局上的波盪，十月，已故太子晃（451年六月卒）的長子濬即皇位，即是文成帝。十二月乙卯，文成帝下詔恢復佛法。文成帝的恢復佛法，一則因佛教在民間的流行興盛，很難因一紙詔書即禁斷滅絕，加上向來以監國身份得問政事的太子晃「潛欲興之」，太武帝晚年滅佛之令的執行並不是那麼嚴格，在都城平城以外的地區，佛教仍然爲人們所敬事信奉。因此，文成帝即位，即應奉佛的群臣之請，而下詔恢復佛教。二則文成帝爲太子晃之子，他有可能自幼即敬事佛教，故在下詔復佛之日，文成帝親自爲假爲還俗的沙門師賢等五人剃髮，並且以師賢爲「道人統」。[154] 沙門師賢是罽賓國人，原來也在涼州佈教，太武帝平涼州時，才被遷到平城。也就是說，北魏恢復佛教之後，來自涼州的僧人仍然主導著佛教的發展，直到和平初年 (460) 師賢去世，方由曇曜繼爲道人統，改稱「沙門統」。

六、結語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隱然和五世紀上半葉北方的政治情況的變化有關，特別是北魏和盧水胡北涼政權的互動，包括北涼盧水胡政權的殘餘勢力——太武帝平姑臧時被遷到平城的一部分沮渠氏王族，和遠走新疆的沮渠高昌政權；以及盧水胡人長期的控制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有關，而盧水胡人的佛教信仰就在其間起了催化作用。盧水胡人蓋吳的反叛之所以作爲滅佛的引

---

153 同前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附子牧犍傳〉，頁2209。

154 同前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頁3035-3036：「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佛法淪廢終帝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矣。……京師沙門師賢，……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爲下髮。」《資治通鑑》卷一二六，〈宋紀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請復之。」

爆點，也就是因爲上述這些背景盤結交錯所造成的結果。

蓋吳反叛引爆了太武帝的全面滅佛，蓋吳反叛平定後，盧水胡的叛變並沒有落幕，獻文帝 (466-471) 在位的時候，還有杏城民蓋平定、成赤李、曹平原先後起來反叛。[155] 蓋平定當是杏城的盧水胡人，成赤李之成姓可能是盧水胡，也可能是屠各。[156] 另外，在蓋吳反叛和其連合的河東蜀薛，除了薛永宗一族全數自沈於汾水、薛安都南奔劉宋之外，此後河東蜀薛致力於和北魏合作，至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496) 定氏族時，薛宗起還爲河東薛氏爭取到郡姓的地位，[157] 躋身於世家大族之列，其後薛氏人才輩出，到唐代時成爲關中的著姓之一。從五世紀下半葉以後盧水胡和河東蜀薛的發展看來，這兩支歸化的民族有著不同的命運，這和他們在北魏政權下採取不同的路線和策略有關。[158]

北朝的滅佛事件所牽涉的背景比較複雜，本文試從一個比較寬廣的背景探討太武帝的滅佛，同時也思考著另一個北朝的滅佛事件——北周武帝滅佛，是否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探討。就以上的討論來看，太武帝滅佛的原因之一是視佛教信仰爲一種團結的紐帶，北周武帝或許也有相同的考慮：其時他剛滅掉北齊，而北齊帝室篤信佛教，整個北齊舊境內佛法寖盛，從鄉村到城市都遍佈著「義邑」、「法義」的佛教信仰團體，從事著各種宗教活動。周武帝或有意藉著全面滅佛的行動，徹底消除北齊境內人民、甚或是官民藉著佛教信仰做爲聚會、連結的基礎。關於北周武帝滅佛，留待來日繼續探討。

（本文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

155 《魏書》卷四三，〈唐和傳附唐玄達〉：「顯祖（獻文帝）時，出爲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眾爲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克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党，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

156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2。

157 《資治通鑑》卷一四〇，〈齊紀六〉，明帝建武三年，頁4395。

158 關於河東蜀薛在北魏的情況，筆者另有專文〈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後漢書》，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三國志》，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晉書》，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宋書》，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南齊書》，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魏書》，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北史》，二十五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資治通鑑》，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
《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續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弘明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廣弘明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李昉，《太平御覽》，台北：大化書局，1980。
王昶，《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羅振玉，《海外貞珉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四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方若著，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蹟錄》，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八輯，敦煌學文獻，第10卷，蘭州：蘭州古籍出版社，1990。

二、近人論著

1. 專書

杜斗城
1998　《北涼佛教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周偉洲
1992 《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洪濤
1992 《五涼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唐長孺
1955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
1983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
陝西耀縣藥王山博物館、陝西臨潼市博物館、北京遼金城博物館
1996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天津古籍出版社。
陳連慶
1993 《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馬長壽
1985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
黃烈
1987 《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湯用彤
1976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鼎文書局。
楊東晨
1994 《陝西古代史》，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齊陳駿、陸慶平、郭鋒
1983 《五涼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1996 《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嚴耀中
1990 《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
大村西崖
1915 《支那美術史彫塑篇》，東京：佛書刊行會。
山崎宏
1974 《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東京：清水書房，1974年再版。
前田正名著，李憑、孫耀、孫蕾譯
1994 《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塚本善隆
1975 《魏書釋老志の研究》，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一卷，東京：大東出版社。
1975 《北朝佛教史研究》，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東京：大東出版社。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
1985 《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高雄：佛光出版社。

2. 論文

王宗維
1985 〈漢代盧水胡族的族名與居地問題〉，《西北史地》1985.1。
王青
1997 〈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西北史地》1997.2。
王炳華
1996 〈絲路"新疆段"考古新收獲〉，收入：《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王素
1994 〈北涼沮渠蒙遜夫人彭氏族屬初探〉，《文物》1994.10。
吐魯番地區文物保管所
1994 〈吐魯番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9。
向燕南
1984 〈北魏太武帝滅佛原因考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2。
余太山
1994 〈西涼、北涼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史地》1994.3。
杜斗城
1994 〈試論北涼佛教對高昌的影響〉，《西域研究》1994.4。
1996 〈劉薩訶與涼州番禾望御山"瑞像"〉，《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周一良
1963 〈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周偉洲
1980 〈試論吐魯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考古與文物》1980.1。
姚崇新
1996 〈北涼王族與高昌佛教〉，《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
施光明
1991 〈北魏蓋吳起義及其性質初探〉，《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專學報（社科版）》1991.3。
柳洪亮
〈試論"承平"年號非且渠無諱所建〉，收入：《一九九四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敦煌研究院。

段連勤
1988 〈公元五世紀上半葉高昌歷史發微〉，《西北史地》1988.4。
唐長孺
1955 〈魏晉雜胡考〉，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局。
1979 〈北涼承平七年寫經題記與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
1981 〈高昌郡紀年〉，《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
1983 〈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
殷光明
1997 〈北涼石塔分期試論〉，《敦煌研究》1997.3。
陝西省文物保管所、長武縣文管所
1987 〈陝西省長武縣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3。
常青
1992 〈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長安佛教與絲綢之路上的石窟遺跡〉，《文博》1992.2。
張學榮
1993 〈涼州石窟及有關問題〉，《敦煌研究》1993.4。
張學榮、何靜珍
1994 〈論涼州佛教及沮渠蒙遜的崇佛尊儒〉，《敦煌研究》1994.2。
陸慶夫
1994 〈五涼佛教及其東傳〉，《敦煌學輯刊》1994.1。
黃文昆
1992 〈十六國的石窟寺與敦煌石窟藝術〉，《文物》1992.5。
黃烈
1987 〈"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管所
1983 〈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的文書〉，《文物》1983.1。
董玉祥、杜斗城
1986 〈北涼佛教與河西諸石窟的關係〉，《敦煌研究》1986.1。
賈應逸
1995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與北涼高昌佛教〉，《西域研究》1995.2。
靳之林
1984 〈延安地區發現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與文物》1984.5。
1989 〈陝北發現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4。

榮新江
1998 〈"且渠安周碑"與高昌大涼政權〉，《燕京學報》新5期。
趙永復
1986 〈關於盧水胡族的族源及遷移〉，《西北史地》1986.4。
劉淑芬
1994 〈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5.4。
1999 〈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國史館主辦，「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1999年12月16日至18日。
盧開萬
1982 〈《魏書・陸俟傳》所載蓋吳之死辨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4。
韓香
1997 〈魏晉南北朝時期陝西少數民族分布及姓氏〉，《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4。
饒宗頤
1990 〈劉薩訶事跡與瑞像圖〉，《1987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
欒貴川
1997 〈北魏太武帝滅佛原因新論〉，《中國史研究》1997.2。
山崎宏
1974 〈隋唐時代に於ける義邑及法社〉，收入：氏著，《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
木口健藏
1938 〈北魏太武帝の廢佛に關する魏書釋老志の記事に就いて〉，《山下先生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六盟館合資會社。
池田溫著、謝重光譯
1988 〈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學輯刊》1988.1/2。
塚本善隆
1975 〈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東京：大東出版社。
1975 〈北魏の佛教匪〉，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
1975 〈北魏太武帝の廢佛毀釋〉，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
Alexader C. Soper（索伯）著，光明譯，李玉珉校
1999 〈北涼和北魏時期的甘肅〉，《敦煌研究》1999.4。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On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Medieval China

Shu-fen L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revious scholarship about the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fifth century by the Northern Wei 北魏 emperor Taiwudi 太武帝 (r. 435-452) has focused on the dynasty's political history, the on-going struggle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even the tensions betwee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is paper, I attempt to approach this topic from a new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e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oblem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medieval era.

Although the event that sparked Taiwudi's suppression campaign was an uprising in 445 led by Gai Wu 蓋吳, a member of the Lushui 盧水 branch of the Xiongnu 匈奴 people, few scholars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on-going antagonism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the Tuoba 拓跋 branch of the Xianbei 鮮卑 people, which ruled much of north China as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fact that Gai Wu and other Lushui people were devout Buddhist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aiwudi's antipathy towards that religion. Even before Gai Wu's rebellion, Taiwudi had fought against the Lushui people in 439 during his campaign against the Northern Liang 北涼 dynasty, which ardently supported Buddhism. Following the Northern Wei victory, over 30,000 supporters of the Northern Liang were forcibly resettled in the area around the capital city of Pingcheng 平城 (today's Datong 大同), but two younger brothers of the Northern Liang ruler fled to Gaochang 高昌 (in today's Xinjiang 新疆), where they continued to resist the Northern Wei while also controlling many of the key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us, it is clear that the Lushui people were bitter enemies of the Northern Wei, and a constant thorn in Taiwudi's side. These historical factors, combined with the scale of Gai Wu's rebellion and his people's devotion to Buddhsim, all contributed to Taiwudi's campaign of suppression against the Buddhist relig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fth century, with special attention being devoted to the origins

of the Lushui people, their migration to north China, and their links to both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南朝. This is followed by a description of Gai Wu's rebellion.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paper concerns the links between Gai Wu's rebellion and Taiwudi's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while the final section treats Taiwudi's attempts to exterminate those ethnic groups that opposed him both during and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ethnic group, Northern Wei, Northern Liang, Gai Wu